

香港浸會學院

中國研究學會 年刊

(九一至九二)



致

李思名博士



目錄

中國研究課程主任的話	3	李思名博士
專題版	4	
中國人口發展的追溯	5	專訪李金強老師
探討中國吸納龐大勞動力的措施	8	專訪郭益耀教授
中國都市化緩慢及人口分佈不均的因由	10	專訪趙曉斌老師
從社會控制角度來看改革開放對中國計劃生育工作的影響	12	邵一鳴博士
校園版	15	
幹事心聲	16	第二屆幹事會成員
我對「上莊」無悔	18	楊少潤
從迎新營說起	19	羅兆麟
最後一年	20	黃雅麗
		黎劍劍
		麥榮康
		黎耀強
清華雜記	22	謝盛昌
學林野史	24	吳系我
學術版	28	
試論國營企業的目標及其行為	29	黃國
淺談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及實踐	32	塵哀

國家、民間社會、社會運動概念的關係	35	荆楚
書介：《思考方法論集》	39	林權
創作版	41	
新詩	42	芷日
		陳永康
		陳薏
		張少強
憑着愛	44	班代表
歲暮	45	謝慧芬
永恒的周恩來	46	璇璣
寓言一則	47	黃子華
新房子	48	祈禱
成長	50	浪子
編者語	51	



序

——中國研究課程主任的話

■ 李思名博士

中國研究學位課程開辦至今已經差不多三年了，本年六月我們將有第一批畢業同學，而中研學會的年刊，也已是第二期了。作為中國研究學位課程主任，在這裡，我謹以誠惶誠恐的心情，祝福本屆的畢業同學，並祈求中研學會和中研年刊茁壯成長。

我校的中研課程，可說是一項創舉，它試圖融合跨科際的區域研究和傳統上以單一學科為主修的課程於一體。我接觸過不少人士，對我校在這個香港回歸在即、華南地區經濟高速發展、中國在世界的政治、經濟舞台扮演一個越來越重要角色的時期，開辦這個中國研究課程，給予高度評價。我相信，我們的畢業同學，定能很快便可在競爭激烈的工商業社會，薪露頭角，並將他們所學，回饋社會。

去年的年刊，以至剛出版的浸會學生報，有多位熱心同學，以愛之深、貴之切的精神，在沉重的功課壓力下，仍撥出珍貴的時間，撰文論述中研課程不足之處。我很感謝他們的好意。製訂這樣一個獨特而富有創意的課程，需要高度的智慧、遠見、毅力與勇氣。我要趁這個機會向所有參與製訂這個課程的老師致以萬二分敬意，我特別要感謝中研課程的第一任課程主任周全浩博士，在過去多年為課程的製訂和實施做了大量的工作。不過，正因為課程的獨特性與創新性，中研課程的結構和內容不可避免地包含一定的實驗成分，我們需要同學們和老師們的鼓勵，以及不斷的善意批評，才可以使整個課程，更臻完美。

正是由於同學們和老師們在實踐中不停給予我和課程管理委員會的大量信息反饋，課程的管理層在本學年進行了一項主要的課程檢討，並就此一檢討結果向校方提交一系列的課程修改建議，希望能於下一學年全面實施。由於這些建議還需得到校務會議通過，我這裡不便詳細羅列。不過，大致上，修改主要是針對一年級的課程，在不影響同學的基礎社會科學訓練的前題下，加強專業學科的訓練，同時盡早提供政治學的基本知識，特別是有關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思潮和制度對當代中國的影響。我們認為，經修改後的課程在學術方面更加充實，而且更能配合四個專業的同學的不同需要。在整個課程檢討工作中，同學們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我特別要向張國樑、方綺慧、袁炳超、黎耀強四位同學表示感謝。在過去半年，他們都能為着他（她）們的“師弟、師妹們”的幸福，積極參與課程檢討委員會的工作。

辦一份刊物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年刊的編委會為此而付出大量的精神、時間和“唇舌”，同時要面對來自各方的批評與壓力。但是，我認為這是值得的。年刊的存在，可讓各中研同學有一個互相交流、表達心聲的園地，更可向學院和學院以外的其他同學、以至社會人士，展示中研同學在各個專業領域的學術成就，並藉此而建立“中研人”和“中研精神”。我們已邁出很重要的一步，讓我們在這個基礎之上，大步前進。◎



專題版



中國人口與發展

中國人口發展的追溯

——專訪歷史系講師 李金強先生

訪問：謝淑玲 羅麗明

整理：謝淑玲

註：李——李金強老師

問——訪問者

中國人口膨脹的問題由來已久，並非四九年後才產生的，就清代以來人口發展的情況，我們訪問了歷史系的李金強先生。

問：中國人口現已起過十一億，當我們回顧歷史時，人口膨脹並不是四九年以後才開始的，你能否為我們解析明清人口加速增長的原因呢？這是否與傳統中國是農業社會有關呢？

李：中國人口膨脹肯定與農業社會需要大量勞動力有密切關係，但有點我恐怕要提出的是人口增長並不是直線上升的，中間也有曲綫，尤其是天災及戰亂時常促成人口銳減，但總的來說，人口基本上是不斷增長的，特別是清代，突破四億大關。這現象我們可以分兩方面分析，首先是與政治安定有關；其次是因為農業有所改進。明清農業改良如水利建設較前代為優，可耕地因而增加，糧食產量提升；另外是農作物出現革命性變化，明清之際新農作物如占城稻米二熟之普及化，蕃薯、玉蜀黍及花生的輸入，為中國提供更多糧食，我相信這點對中國人口增長是有一定意義的。除了口糧增加外，人口增長必須具有政治穩定的前提的。我舉個例子，明末清初政治因戰亂不穩，內有流寇，外有滿州入侵，滿州人入關之後又有南明及三藩之亂，戰亂頻仍，人口銳減。真正的人口恢復相信是於十八世紀四零年代至十八世紀末這段期間，據估計這時中國人口已突破二億，

至一八五零年後中國人口增長又開始回落，這與帝國主義、太平天國之亂及西南、西北回亂捻亂具有密切關係，及至四九年以前中國人口大約是四億五千萬左右。總的來說，中國人口增長除了與農業社會「多子多福」有關外，還必須配合政治穩定、農業改革與經濟成長等客觀因素來看的！

問：然而人口增長，每每因耕地不足，出現人口流動。康熙雍正年間，廣東沿海居民於春季前往台灣耕種，秋收時則回鄉生活，藉以減輕人口壓力，其實過去中國平民面對人口過剩時是如何解決的呢？

李：關於傳統中國人口流動問題，首先我要提出經濟週期這概念，即人口與土地分配的循環現象。歷代皇朝建立以前都經過戰爭，戰亂造成大量死亡，出現剩餘耕地，新皇朝確立政權以後，每每重新分配土地，由於人口較少，所分配的土地相對地多，糧食也開始增產，同時亦帶動經濟穩定和繁榮，盛世因而出現，但這繁榮景象每到朝代中後期便出現問題。由於中國是實行財產均分制度而不是長子繼承制的、一個家庭子孫越多，每家庭成員所得土地越少，於是每到朝代中後期便出現人口為土地分配不均現象，這批沒有耕地的農民

通常遷往他省或城市尋找職業或另覓土地，他們在當時是被稱為「流民」的，與現今的盲流很相像。發展到朝代週期末年，在沒有可耕地的情況下這批「流民」每每轉為流寇，破壞地方秩序，威脅皇朝的治權，如漢黃巾之亂，因此在中國傳統皇朝，人口與土地分配對於治亂興衰是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面對人口壓力時，人民是會選擇遷往他省或流寓海外。粵東閩南之居民在雍乾以後已經開始流入台灣覓耕。台灣於康熙廿年平定鄭成功之亂以後成為禁地，不准人民進出，然而台灣可開發之耕地甚多，於是人們便採用你們剛才所說的春往秋返的農耕方法藉以為生；除了台灣外，還有不少過剩人口流入今日兩湖地區的漢水、長江交界或者遷入山地從事耕種經濟作物，包括煙草、藍靛、蔗糖、茶葉或者開礦等來解決生活，上述經濟作物不一定需要種植於平原、正好適合生長於東南丘陵地帶，因此促成明清時期手工業特別發達，這也是為何大陸史家稱明清為資本主義萌芽期的原因。另外還有一批人移民東南亞一帶如安南、菲律賓、暹羅、泰國及印尼，不過大規模的華僑出外恐怕是太平天國之亂以的事了，當時東南亞一帶開採礦藏需要大量勞動力，閩粵過剩人口便在情況下流寓海外、形成十九世紀下半葉所謂的「豬仔」貿易。香港即為當時一著名的「豬仔」貿易港口。



問：政府面對人口壓力時又有何對應辦法呢？

李：上述平民遷往他省覓耕於明清時期基本上是非法的，因為明清是實施嚴格的戶籍限制的，遷往他省時人民必須得到地方政府給予路引，否則便是越界、犯禁。水利建設、墾田等地方基層建設基本上是由知縣負責的，一般而言知縣及地方士紳都會努力注意勸耕及開發水利耕地藉此解決生計的。

問：地方士紳面對人口過速增長是否會有控制生育的思想呢？

李：以我之瞭解傳統中國是沒有節育這種概念的，反而有所謂「房中術」增加生育。

問：你剛才說明清人民若沒有路引而遷往他省是犯禁的，為何要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呢？

李：這就涉及中央對地方控制的問題了。中國傳統以來都是中央集權國家，故此着重地方控制，它要求人民必須不造反，當大批人口離開土地流入他省時，自然難以控制，容易造成亂事，這正是剛才所說的朝代週期末年所出現的流民，結果變成流寇，造成混亂，因此要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

問：過去的與今日的戶籍制度是不是有着相類似的呢？

李：兩者是十分類似的。明清以前已有戶籍制度，但明清以後其制度更趨完善。所謂戶籍制度明代稱為里甲制，清則稱之為保甲制。里甲與保甲將城市及農村人口以十進

制方式劃分戶口，每里設里長，甲設甲首、里長及甲首紀錄每戶人口變化的資料向縣級上報；至民國時期在相當程度上仍是沿襲這一制度的；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雖自稱是共產國家，但其中很多制度也是脫胎自傳統，對戶口也作嚴密監視及管制，而台灣也有這種情況呢！

問：四九年以後中人口快速增長，除了是由於政治穩定、醫療福利改善、傳統觀念及中國本身人口基數大等因素所導致外，還有其他什麼原因呢？

李：這恐怕是與首長的意見有關呢！當時的國內著名學者馬寅初於一九五七年所發表的「新人口論」主張控制人口數量及提高人口質量，但因毛澤東曾提出「人多好辦事」，而當時正值大躍進時期，國內出現「反右」鬥爭，打擊知識份子，馬寅初因此而受到批判，控制人口政策也因此而停頓下來，毛澤東以開國元首身份之影響力提倡人口繁衍，相信對中國人口激增是要負上一定程度的責任的。此外毛澤東是打游擊出身的，善用人海術，在火力不足的情況下以人力補救，爭取戰場上的主動。建國以後毛澤東將此一戰略觀念移向經濟政策，因而帶出其經濟惡果。

問：人口增加與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又是否有關係呢？

李：這的確也會導致人口過剩的，因為父母多生孩子不會為他們本身帶來太大負擔，但另一方面卻會為他們新增口糧呢，故此人口增加也是與制度有關的。

問：人口過剩相信與盲流的出現是有一定關係的，現在廣東的盲流與明清「流民」有着什麼相同相異處呢？

李：兩者是十分相似的。現在的盲流主要來自兩湖及安徽一帶。兩湖地區近年經濟很差，安徽則受自然災害影響，故兩地人民流向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希望尋找工作，其流民性質與傳統的分別不大，不過傳統流民大多集中鄉村地區荒地從事耕作，而不是往城市為產業工人。

問：最後想請問李先生認為「國家有權干涉生育，控制人口。」這句說話具有多少合理性呢？

李：這問題很難有一定論的。現時國家控制生育及人口恐怕是有必要的。現在國內經濟還算好，若果人口再繼續增長相信是會在一定程度上拖跨經濟的，這對政治也沒有好處。我再舉一例子支持我的觀點，現在的明清史專家王業健先生曾提出明清經濟成長結果被人口增長所銷蝕，故此出現了所謂「廣泛性成長」而未能進入資本主義階段，使生產力躍升。結果資本主只是曇花一現。我認為中國大陸若要經濟有所發展恐怕區域性的人口控制及人口遷移是十分重要的，例如沿海城市人口過速增長是需要這樣做的，否則城市基本建設難以提供！不過現在國內所實行的「一子」政策亦引致不少殺女嬰的事件，在將來甚至可能造成性別不均等社會問題！總的來說人口控制是有區域性及時期性的，在人口過剩地區如沿江沿海一帶人口控制是十分需要的；就時間性方面而言，則要視乎經濟發展至甚麼階段，若經濟發展上有一定成長時，在可以解決人口壓力的前提下可考慮放寬人口控制，然而現階段的中國，節育計劃是無法避免的！



他們（明清一些沒有耕地的農民）在當時是被稱為「流民」的，與現今的盲流是很相像的

探討中國吸納龐大勞動力的措施

專訪經濟系 郭益耀教授

訪問：陳少蘭 黃子華 謝淑玲 羅麗明

整理：黃子華

註：郭——郭益耀教授

問——訪問者

一九四九年開始，中國政府於不同時期，對於「人口」有着不同的看法，因而有迥異的經濟含義；而亦有施行一些措施去吸納大量的勞動力。很多謝經濟系的郭益耀教授能抽空接受我們的訪問，探討這兩大方面的問題。

問：在五十年代，毛澤東曾提出「人多好辦事」的口號，請問背後有甚麼經濟含義？

郭：「人多好辦事」是大躍進時期提出的口號。當時，中國希望以勞動密集的發展方式於短期內使經濟起飛。這口號提出的目的是想發動農村的剩餘勞動力，進行各樣基本建設，例如水利工程等，務求以大規模勞力動是來達到經濟發展的目標。這口號同時也可視為政治動員，以進行經濟建設；或以「政治掛帥」代替「物價刺激」。因為若透過市場機制或提升工資來增加勞動力供應量，必然導致政府龐大的開支，因此希望透過「人多好辦事」口號使農民在非物質刺激下，主動為國家提供勞動力，保證經濟發展中需要的勞動力的質和量。

問：七十年代後期，中國意識到龐大的人口是經濟發展的重大包袱，故實行一子政策，那麼人口與經濟發展有甚麼關係呢？

郭：在人口壓力下，經濟發展是有一定困難的。經濟發展的速度，基本上受投資多寡所限制的。在經濟學上，投資可以區分成

人口投資（demographic investment）和技術投資（technological investment）兩種。人口投資是指為維持新增加人口的生活，和給新增勞動力配備工具的投資。技術投資是指擴充生產裝備，使資本集約化（capital deepening），提高生產力，發展經濟現代化的投資。若人口增長過快，則人口投資必十分龐大，使技術投資減少，國家的經濟發展亦會被拉慢甚至停滯不前。其實中國人口增長過快對經濟發展有不良影響的論點，早於五十年代後期，學者馬寅初先生已經提出，並非始自七十年代的。

問：請問中國農村及城市人口膨脹方面有着什麼分別及影響？

郭：就人口膨脹問題來說，農村比起城市是嚴重得多的。理由是城市環境中生育控制較易；農村環境中則較難，而且農村改革以後，農民收入上升，有更多渠道維持新增人口的生活需要。城鎮工業部門的發展速度顯然受一定的資源與技術條件的限制，很難加速吸納剩餘人口，所以中國政府一

直以來都透過戶籍控制農民不能自發流入城市，以免加重國家財政負擔及造成多種社會問題。因此，新增人口主要靠農村部門吸收，引致農村失業或隱蔽性失業程度偏高。

問：中國政府在城市及農村有施行經濟改革措施，請問這些改革措施能否吸納中國龐大的剩餘勞動力？

郭：經濟發展水平愈高，其可承受的人口亦愈多，但總的來說，農業與工業經濟的發展速度是受一定客觀條件如資源與技術水平的制約的。何況在個人平均收入偏低的情況下，資本積累有限，很難期待經濟發展能取得任何突破。換句話說，剩餘勞動力的存在是一個長期性的問題，並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政策的調整在這方面當然也能起一定的緩衝作用。過去十年，農村擺脫文革時「以糧為綱」的政策，鼓勵多元化經營，大力發展鄉鎮企業，都創造了不少就業機會。城鎮方面准許個體經營活動，以及吸引外商投資也吸納不少的剩餘勞力。目前在珠江三角洲有三幾百萬人為港商投資的工廠工作，便是很好的說明。但這距離全面解決龐大的剩餘勞動問題還遠呢！

問：請問鄉鎮企業能否解決人口過剩的問題？

郭：雖然十年來工業發展速度很快，但由於工業部門愈發展，則資本集約的趨向會愈明顯，換言之，努力於生產中愈居於次要位置，所以單憑正規工業部門來紓解人口壓

力是比較困難的。這是鄉鎮企業興起的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希望發展勞力密集型的小型工業，使農村工業化，逐步解決人口過剩的問題。實際上，過去十年中，鄉鎮企業雇用的農工，也由一千多萬人上升到目前將近一億人，這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數字，接近城市中多種職工人數的總和。但是鄉鎮企業是不是可視為解決人口過剩的一個長期的，有效的策略，這則難以下定論。過去鄉鎮企業發展極速，其中主要的因素是在於政策鼓勵之下，農民有興趣發掘及利用多年來穩藏不用的農村資源（包括截取國家計劃供應給正規工業部門的資源）。在快速增長之後的增長放慢是可以預見的。

問：請問「國家有權干涉生育、控制人口」這句說話是否合理呢？

郭：這種說法合理與否牽連到價值判斷問題，恐怕非經濟學的研究範疇。事實上，不論東西方很多國家（先進或落後），都有其人口政策，重點都是要使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相配合。各國採取的干涉方式不同，有些是間接（透過稅收，財政補貼等）鼓勵或懲罰，中國則採取比較嚴勵的直接（透過生育指標等）控制辦法，顯然是「重藥對重症」，從控制人口膨脹的立場來看問題，其效果是人所共知的。這廿年來，它使中國的人口增長率超越西方先進或發展中國家的長期變遷規律，逐步下降到接近於高人均所得國家的水平。這的確是很難得的。



鄉鎮企業是不是可視為解決人口過剩的一個長期的，有效的策略，這則難以下定論

中國都市化緩慢及人口分佈不均的因由

專訪地理系講師 趙曉斌先生

訪問：梁志深 陳少蘭 陳柏林

整理：梁志深 陳少蘭

就着中國人口及發展的主題，我們很高興邀請到地理系的趙曉斌老師為訪問對象，探討一下中國都市化緩慢及人口分佈不均的原因。

背景

現在中國有十一億多人口，但人口分佈卻呈現了特殊的情況，即「二八開」，而九零年中國城鎮化水平是百分之廿六，約兩成人口居住於城市，而其餘主要八成人口則住在農村，這基本上是過去四十多年的概況；為何建國後經過這麼多年，都市化仍這麼慢，而人口仍是「二八開」這般不均呢？在這篇訪問中，趙老師會為我們剖析來龍去脈。

目前中國人口約佔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一，而中國地域面積為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但約有三分之二地域難於利用，所以土地相對於眾多人口來說是缺乏的；更加嚴重的是耕地的匱乏，因為只有十分之一的土地可供耕用，即平均每人擁有耕地為0.1公頃；令情況更惡劣的是土地的嚴重流失，每年多達二千萬畝之巨。

生態能力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中國耕地只佔世界百分之七，但卻承載了世界人口百分之廿二，所以其生態能力是相對脆弱的；況且，十分之一的可耕地中，高糧田只有三成，其餘七成均為中低產田，使土地壓力更重。

一九七九年前

趙老師明確地指出，一九七九年前城市化速度緩慢的原因很複雜，簡單來說有兩個因素：一為行政因素、二為經濟政策問題，而緩慢的城市化亦加劇了農村與城市的分割。

1. 行政因素

中國於一九五八年實施戶籍制，其原意是阻擋當時不斷流向城市的盲流，但慢慢發展為城鄉分離政策，使人口分為城市戶口及農村戶口，在這種制度下，城市人口的福利均高於農村人口；城市人口享有平價糧食，住戶津貼，優惠醫療服務等等；農村卻剛好相反，在戶籍制度下，農村戶口不隨意進城，更遑論成為城市戶口。四十年來，中國政府便是使用戶籍制度來達致都市人口數量的穩定，其後果為都市化滯後，強化其人口不平均分佈。

2. 經濟政策

趙老師特別指出，經濟政策才是城市化滯後的主因。一九七九年前，中國政府有意將工業歸為城市，農業歸於農業（偶有例外）；在農村裏，大多時間只鼓勵單一經濟，即從事農業，其中又以種植業為主，這種政策使農村產

業結構失衡，並且，其經濟政策又受政治及政治口號影響，農民規定不能經商或從事多種經營，否則會被視為有「資本主義」尾巴。

三十年來，農民一直被困在農村土地上，雖然農村大多時間只單一作業（農業），但糧食問題仍未能解決，農村依舊沒有可觀的發展。

在城市中，政府大力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而輕視、疏忽了輕工業及消費品，這種城市偏傾（Urban Bias）的政策，使城鄉兩頭不到岸，城市經濟不能發展，從而不能吸納農村的剩餘勞動力；總括來說，七九年前的政策是抑制城市發展、孤立農村、分割城鄉，工業長期低速發展，強化了城鄉的「二八開」。

一九七九年後

從以下數字可以看出七九年以後，城鄉分割開始有轉機：一九八二年都市化水平只有百分之廿，到一九八六年則增至百分之廿六。但趙老師特別指出我們是要留意城市定義的轉變及放鬆的，瞭解這點以後我們才可明白城市化為何會有這麼快的增長。無論如何，一九七九年後城市化水平確實有增長趨勢的。

鄉鎮企業的崛起

一九七九年後，城市經濟仍未能有效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Surplus Labour），在這情況下，隱性失業的危機，隨人口增長又再出現，所以，鄉鎮企業便順理成章地在農村建立起來，走一條「農村自己的道路」，十年來鄉鎮企業吸納了一億多農村勞動力，農民收入大大提高。

但趙老師強調鄉鎮企業仍有其負面，它是被迫出來的，大多缺乏規模經濟，更諷刺的是過去三十年來政府積極建設城市經濟企業，於經濟改革下卻先在農村這個一無所有的地方發展工業，其發展上的成功是相對於城市工業（特別是中型企業）缺乏效率而言的，再者，鄉鎮企業在過去十年的成功是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的，如農田的損失、污染及缺乏規模經濟。

總括來說，一九七九年後雖有城市化的增長但卻是緩步的，剩餘勞動力的吸納以鄉鎮企業為主，城鄉間的分割雖減弱，城市及村人口

雖可有限度流通，但戶籍制度仍在，於此情況下，城市化水平仍低，人口的分佈只是二點五比七點五開吧了！

總結

最後，趙老師指出，只有工業發展，城市化才能擴大；只有城市化擴大，人口分佈的不平均才能解決，隱性失業才能紓緩，因為就吸納勞力方面而言，城市工業的吸納能力始終比鄉鎮企業為大；在善用資源方面來說，大規模工業實比鄉鎮企業效率為高，輸入同樣資料，大規模工業總比小規模工業的生產率高。如果中小型企業在將來仍佔主導地位的話，對稀少的資源（相對中國廣大人口而言）是會造成浪費的。

另外趙老師更指出現今問題重點不應放在人口上，而應大力發展經濟，提高城市化來減少人口分佈不均；若果經濟有所發展、廣大的人口壓力也將消解，這是一個相對的問題，所以雖然香港的人口密度比上海（中國人口最稠密的都市）還大幾倍，但經濟發展足可支持其龐大人口。廣東珠江三角洲經濟蓬勃發展吸納大量外省勞工（二百萬？三百萬？）又是一例証。



現今問題重點不應放在人口上，而應大力發展經濟，提高城市化來減少人口分不均

從社會控制角度來看改革開放對中國計劃生育工作的影響

■ 邵一鳴 博士

如要用社會學理念去探討「中國人口與發展」，社會學系的邵一鳴博士認為可從社會控制的角度去討論有關問題。在此多謝邵博士為今年的中研年刊撰寫這篇文章。

1979年，中國推行兩項影響深遠的政策。一是要一心一意搞建設，發展生產力，堅持改革、開放總方針；二是要控制人口增長，為了使中國人口在2000年時維持在12億內，鼓勵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前者就是經濟上要實行改革開放，後者就是計劃生育要收緊，實行國外學者所謂之「一胎化」政策。這兩者被稱為實行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國策，但是它們所產生的後果是否有矛盾衝突呢？本文旨在討論自七九年來，因改革開放而削弱了城鎮的社會控制力量，從而為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帶來新難題。

七十年代初期，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重新納入正軌。生育率在八年內下降了超過五成。因為城鎮基層組織嚴密、福利好和生活水準高，城鎮的生育率比農村的下降大。到了八十年代，城鎮的生育率已低於更替水平，因此中國政府在城鎮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比在農村的更為嚴峻，規定除了甚少的特殊情況經批准者外，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至於農村方面，除了特殊情況的界定較多外，有很多省區是容許「獨女戶」間隔幾年後生第二胎，甚至有六個省是允許漢族夫婦普遍生二胎。因篇幅有限，本文只集中討論改革開放對城鎮中帶給計劃生育的問題。雖然現時中國計劃生育的難關是在農村，但是近來城鎮的生育率已有回升趨勢。另外，改革開放對城市社會控制工具衝擊所帶來的社會結果，亦是本文探討的其中一個課題。

內在規範與外在控制

一胎化政策已實行超過十年，城鎮居民的生育意願是否和他們的行為一致呢？近年的調查結果指出，他們主要還是希望有兩個孩子，甚至子女雙全和一些重男輕女的思想。^①那麼，為何城鎮裏還有相當多的獨生子女戶呢？主要原因是在社會控制有效，城鎮基層組織嚴密，對居民的思想和行為有顯著的影響。

建國以來，為了在極低的經濟水平上加促工業化，中國不得不實行強制的資本累積。這個目標導致國家對主要的口糧實行統購統銷，切斷了城鄉之間的市場聯繫。跟着，再運用戶籍制度來將城鄉人口截然分開。人口流動，尤其是農村湧入城市的流動，被控制至最低水平。這樣，城鎮居民便不得不乖乖地受三種社會控制工具所管制；它們便是單位所有制、戶口制度和糧食定量供應（即糧票）制度^②。這三個制度緊密地聯繫着，發揮互補不足的效用。

單位，是對工作單位的簡稱。在中國，除了農民，靠自己種田養活以外，任何人要維持生活，就要依負一個工作崗位。不論是政府機關、工商機構、學校、醫院、飯店旅館等，都統稱為單位。它對每一個城鎮就業公民具有重大的影響力；不僅是工資是來自單位，而且諸如衣、食、住、行及生、老、病、死的住房、生活津貼、出外證明、結婚登記、退休金等一切福利保障和登記證明也來自單位^③。依賴愈

高，受控制的機會便愈大。

戶口制度決定了中國人民的等級和居住地方。農民拿的是鄉村戶口，不能隨意遷入城市居住，亦不能享受國家補貼給城鎮人口的一切福利如交通、住房、醫療、退休金等等。沒有了戶口，不只沒有上述的福利，甚至連維持生活的工作也找不到。

糧票制度主要是穩定糧價，由國家統購統銷主要口糧，每年便要花數十百億元在糧食補貼。不過，糧票亦是一件重要的社會控制工具。在中國，城市居民是靠糧票去購買主要口糧的。沒有戶口，亦即沒有糧票，那麼連吃飯也發生問題了。

改革開放削弱外在控制

1. 單位控制影響減弱

改革開放帶來城鎮社會經濟上有結構性的轉變，亦大大地削弱了以前行之有效的社會控制，職工對單位的依賴性也大不如前了。改革開放使單位有結構上的改變。這些改變包括了取消終身制，改用責任制和合同工制度，減少生活津貼和增加各種鼓勵生產的獎金。廠長承包責任制加強了領導階層對工人的依賴^④，因為工人的生產量直接影響他們的成績和前途。再加上中國勞工市場還是屬於封閉性，工人來源是有限制的，這使領導階層不能如以前地專制。而且，在經濟掛帥下，單位減弱對工人的思想工作，亦減少了對工人日常生活的限制。另外，以獎金代替了福利津貼亦使工人的自主權增加，工人可以決定如何使用勞力換來的金錢，甚至可以用來支付超生罰款。

2. 個體戶自主性高

改革開放不只削弱了單位對它的職工的控制，甚至使更多的城鎮居民不受單位的控制。單位已不再是唯一的工作分配來源，愈來愈多的城鎮居民改為自營作業，或稱為個體戶。1978年，全國只有15萬個體戶，這是建國以來最低的數字。1989年，這個數字上升了43倍，達到648萬^⑤。改革開放亦開放了人民的職業市場，增加了人民在勞動上的自主性。

城鎮超生的主要對象是無業居民和個體戶。例如，他們佔了長沙市自1981年至1985年超生總數的95%以上^⑥。做成個體戶超生的原因有三：一是他們普遍收入高，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不愁養兒育女，只盼望兒子雙全，以為只要交了罰款便可以生二胎，甚至多胎^⑦。二是養兒防老心理作祟。個體戶因為沒有單位提供退休福利，他們大都希望日後年老時有子女供養，生多一兩個也是個保險，再加上中國傳統還是兒子供養父母的佔多，他們一定要追到一個兒子的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三是管理困難和工作配套出了問題。個體戶長期分散經營。難於管理，思想政治教育亦跟不上。管理個體戶的計劃生育，主要是街道辦事處和其轄下的居民委員會的責任。但是，隨着個體戶數目和他們收入的增加，街道和居委會對他們的控制力便減弱了。要把計生工作辦好，就要依賴其他部門配合。但是，要配合的部門很多，包括宣傳、婦聯、工會、共青團、衛生、公安、政法、民政、工商和文化、教育，而且還要制定一套個體勞動者計劃生育管理辦法^⑧。本來，如果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能夠配合工作，在每年個體營業執照年審時，查檢個體戶的計劃生育情況證明。但是，工作配套卻通常不如人願，原因是工商局通常怕工作難做、怕影響本職和怕出錢；況且，對他們來說，計生是小事，工商行政才是大事。業務工作還忙不過來，那有功夫去做計生檢了芝麻丟了西瓜^⑨。



3. 流動人口管理難

除了單位控制力減弱以外，因為自由市場的蓬勃，糧票制度也形同虛設了。隨著糧票重要性的消失，戶口制度亦難發揮它的控制力。近幾年來，隨着改革開放和人民生活水準上升，人民出外務工、經商、旅遊和探親訪友的逐年增加。根據九〇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資料顯示，全國離開戶籍所在地一年以上的流動人口有2100萬，加上離開戶籍所在地一年以下的流動人口，共約七千萬。換句話來說，每16個中國人便有1個離鄉別井，在外生活。在這些人中絕大多數是處於生育適齡階段，而有相當數目是流入城鎮裏，這便使城鎮的街道和居委會的計生工作百上加斤。

流動人口的增加給計劃生育管理工作帶來了新的問題。婦女離開了她們的戶籍所在地，她們的計劃生育的行為是由誰來監管呢？按政府的統一規定，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仍然由他們的戶籍所在地街道居/村民委員會負責，工作通常是採取通信聯絡，爭取當地工作單位或街道居委會的支持和配合。可惜當地的單位和街道居委會已自顧不暇，那裏有時間來管理外來人口的計生工作呢？雖然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在1991年12月6日首次頒發了它成立十年後的第一號法令——《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辦法》，但是為時已晚^⑩，問題已擴散了，況且兩地配合管理仍是一個大問題。

結論

隨着城鎮，經濟體制，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發展，城鎮的社會結構正迅速轉變，社會控制亦大大地減弱，人民的生活和行為也因此而改變，失控、分歧和衝突就會出現。情況就如黃枝連在他的《社會情境論》一書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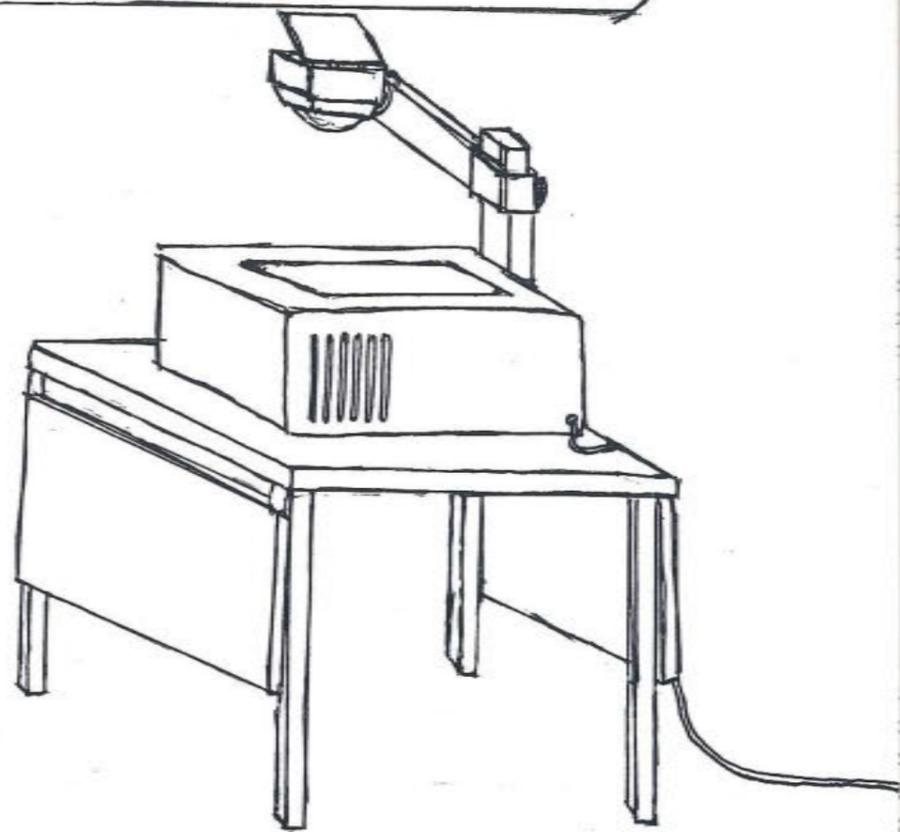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必然經常出現『模糊情境』和『危機情境』；原因在於原來的情境結構正被拆除（或消失）之中，新的東西還未完成（或者根本付之闕如）；因此，人們進入流動中的情境裏，其權、責、利、功、過可能還沒有交代，叫人“措手無策、無所適從”；……更有甚者，由於結構上的模糊及混亂，人們容易各走極端，或同一個人在不同時候時走不同極端，使到角色的溝通及協作難以進行——這就形成了所謂『危機情境』了。」^⑪

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進入一個轉型期，舊的結構在拆除中，新的結構還未成立起來；舊的社會控制在減弱中，新的社會控制還未形成。在這種「模糊情景」中，鑽空子和非正常的渠道多了，使更多人能比其他人得到他們追求的東西。生多一個孩子只不過是許多目標的其中一個。這樣，社會利益差別便會擴大，分歧日深，而摩擦衝突便會比以前激烈。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中國社會發展報告》^⑫中，亦指出舊的體制不再適應現實要求，新的體制還未完全建立起來，新舊兩種社會體制、結構、秩序、規範和控制並存交替的局面將會持續一段時間。由此產生的社會性衝突、社會機制摩擦、社會利益差別擴大、社會分化情況惡化，社會失序現象嚴重等，將會異常激烈。改革開放政策不只使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亦使一部份人享有其他人沒有的特權——生多一個孩子。社會控制的減弱使社會分化和分歧增加，如果改革開放不深化擴大，使更多人能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社會失序情況便日益嚴重了。^⑬

註釋

- ① 吳笑天「獨生子女父母的生育意願」《人口研究》1991年第5期，頁30-33。王友彬「90年代育齡夫婦生育心理特點——山東省新婚夫婦生育心理調查」《人口研究》1991年第6期，頁49-53。
- ② 千家駒「治國無方，治民有術——中共建政四十二年成績總結」《信報》1991年10月3日，4日，5日，7日。
- ③ 韓風「單位：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形式」《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第1期，頁71-88。
- ④ Walder, Andrew G. "Factory and Manager in an Era of R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 118 (1989): P.242-264.
- ⑤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1990》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0年，頁113。
- ⑥ 趙連義、胡吉珍「長沙市控制無業居民和團體戶再生調查」《南方人口》1986年第4期，頁37-39。
- ⑦ 東山區政府南區黨委會、東山區政府南區辦事處「加強街道的計劃生育宣傳工作，為實現人口計劃提供重要的思想保證」《南方人口》1988年第1期，頁38-40，50。
- ⑧ 中共東山區委員會、東山區人民政府「在改革開放中積極探索宣傳的新路子」《南方人口》1988年第1期，頁23-27。
- ⑨ 東山區工商行政管理局「發揮工商管理職能作用，加強團體業戶計劃生育宣傳」《南方人口》1988年第1期，頁28-30。
- ⑩ 廣東省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辦法早於1987年7月11日訂立比全國的早了四年多。
- ⑪ 黃枝連《社會情境論》香港：中華書局，1990年，第35頁。
- ⑫ 《明報》1990年3月5日，第9版。

校園版



自七九年來，因改革開放而削弱了城鎮的社會控制力量，從而為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帶來新難題

對不起，我…… 財政 蔣潔玲

偶然地，我上了「莊」；深刻地，我發覺理財的工作並不容易。這主要是資源分配上的問題。各方的代表，如康樂、出版、體育等，他們站在自己的立場，當然是要極力爭取資金使用，才能「發大來搞」，做點成績來看。但站在我的立場，身為一個財政管理者，要用有限的資源來分配無限的需求，實在是不可能，故此唯有「量入為出」，收緊各方面不必要的開支。在此，希望各方好友多多原諒。

變得成熟的好捷徑 秘書 鄧綺美

做了中研的秘書快足一年，確實給了我許多待人處事上的寶貴經驗，這可用四個字來總結我的感受——嚴謹和認真。無論是高層的會議紀錄或是其他幹事稿的活動，都要求嚴格認真，這是與在中學所擔任的什麼幹事，什麼職位的要求有着天淵之別。我想，這是在大專生活中，令人處事成熟，自我訓練的一個好捷徑。

我的感覺 學術 廖淑芬

如若問我你為何現在未快樂
如若問我你心裏為何忐忑不安
如若問我我是因你冷漠的態度
如若問我我是因你可怕的沉默
如若問我我是因你
如何不說一語而兩心知
如何能使你打開沉默的匣子
如若問我說出心裏的感覺
如若問我你不發覺」

出晒位

出版 羅麗明

最高紀錄

1990年 為 A-Level 考試讀書至凌晨四時。

1991年 為會訊及 Directory 做至凌晨五時。

感覺

上莊初期 開心

上莊中期 辛苦到出晒位

將會落莊 高興？！

假如……

沒有答應上莊 虛渡二年級

像現今上了莊 待人處事皆圓滑了很多

「透明人」的感言 福利 李麗嬌

如要我用一百字將這一年來的感受寫出來，實在太少了，恐怕一千字，一萬字都不會足夠。
但一百字對我來說又好像太多了，因為我此刻的感受，用兩句說話：
「有人歡笑有人愁」
「肥巴吃黃蓮」
但願日後能像「陶淵明辭官歸隱」般……

可貴的經驗 內副 謝鳳燕

時間飛逝，不覺又快到「落莊」的時候了。回顧在任期間，我對「得應事來處之以務，失意事來處之以忍」這句話有更深刻的領悟。畢竟，能夠當中國研究學會的幹事是我的榮幸，當中的滋味苦樂參半，也是我生命中心可貴的經驗。

1/2苦 1/2樂 體育 曾綺玲

苦？不！樂？不！

在這一年幹事生涯中，有很多令我沮喪的日子，而快樂卻像離我很遠的。在跌跌碰碰中，我一次又一次的站起來，但總覺得力不從心，而且傷痕亦愈積愈多似的。然而，令我最開心的能夠找尋得到一份友情。另外，當上中研幹事亦是人生的一次考驗。最後，想藉此向每一位曾經幫助我，和參與過賽事的同學說聲謝謝。

脫苦海 康樂 袁妙玲

快要「落莊」了，霎時間的感覺是想大聲疾呼「我終於能脫苦海了」。回想過去一年自己所負責的活動——迎新營、迎新夜、中研旅行和學生節等，始終覺得自己仍未做到「最好」，仍有待改善。可幸的是中研同學的參與率仍頗高，尤其是學生節的拔河比賽，更顯中研同學的投入和團結。因此，我覺得中研是有接班人的，希望下任的康樂幹事能做得更好，使中研同學更團結，發揮中研本色，成為一股動力。

插莊人 宣傳 劉華韜

記得去年的「忠閣」落選後，雖未有失落的感觉，但已打消了我「上莊」的念頭。後來因一位幹事轉枝，我便擔任了宣傳一職，重拾已淡忘的熱誠。宣傳一職我從未嘗過，而「插莊人」亦特別，幸好很快我便適應過來。任內的工作雖不繁重，但很瑣碎，每項節目都要作一番宣傳，但令人失望的是參與率一如以往，不知是宣傳不足或……，無論如何，希望下年同學能踴躍參與各項活動。

衷心的一句 公關 蘇紀嫻

時光飛逝，「落莊季節」將至，我的公關生涯亦將結束。在負責對外聯絡和辦電影籌款及聖誕晚會等活動中，除了獲得寶貴的經驗和結識更多朋友外，最令我難以忘記的就是每當我遇到困難時，同學們皆在精神和行動上給予我莫大的支持，這份真摯的友誼實是我最大的收穫，亦藉此機會向他們衷心說聲「多謝」！

致謝 外副 蘇偉業

外務副主席最特別的工作莫過於出席學生會代表會會議，而我可說是出席率最高的幾位代表之一，從中我體驗到一個龐大組織的運作情況及所產生之問題，這對我有一定的裨益。然而，總覺得自己並沒有足夠的代表性出席此會議，因為同學只是選我作為「外副」，並非中研同學的代表，因此像沒有合理地位替中研的學生會會員說話。無論如何，我必須向各位支持「衍華閣」的「選民」致謝，給我這個學習機會。

幹事 心聲

我對「上莊」無悔

■ 中國研究學會第二屆幹事會 衍華閣主席楊少潤



在這個新舊莊交替的時刻，自不免思緒翩翩，過去了的種種苦與樂都湧上心頭。

一年的時間，在人生漫長的旅程中並不算長，回想起去年這個時候，正是積極籌備「衍華閣」的時候，當時的景像，猶如昨天一般，記憶猶新。當時十多位幹事憑著一股衝勁、一種犧牲的精神和一股真摯為中研同學服務的心去組閣，希望能夠搞好中國研究學會和提高中研在校內、校外的地位。那種齊心協力、互相支持、互相鼓勵的感覺，真令人難忘。

回顧這一年的工作，苦樂參半，失去的很多，得來的也不少，相信各位幹事也有同樣的感覺。學會的工作，著實花費了幹事們不少的心血和時間，但換來的未必是開心與滿足，相反，可能是灰心與失望。如電影籌款、新生輔導日和徵文比賽等都令人感到灰心不已。大家辛辛苦苦，出晚歸，費盡心思去籌備某項活動，換來的只是「無時間」、「約唔人啦」、「無興趣呵」等等的說話。有時我覺得，成功與否都不是決定在你付出的多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只是一個笑話，你的真誠、心血，對於很多同學來說，只是微不足道。

擔任學會的工作，並非一般同學想像中那麼簡單和容易；身

為學會的主席，更是吃力不討好。除了要處理會內的日常事務外，還要出席種種出乎意料之外的會議，其中最深刻的一次是開「搬遷委員會」後，追尾班車的狼狽情形，那種感受，並非個個可以體會到的。

最令我感到分身不下的，是在同一時間內有多種活動舉行，我知道各幹事要擔當自己的職責，大家都忙得喘不過氣來，看似簡單的節目，其籌備過程，花費的心機和時間，以及在籌備過程中所遇到的壓力與挫折是可以體會的。但很多時候，最令我傷透腦筋的，就是順得哥情失嫂意，比如出席了體育活動，就自不免有點疏忽了其他活動，加上期間還要出席一些瑣碎而繁複的對外會議和跟進租借場地設施等等，真有點筋疲力盡的感覺。在這種情況下，若得不到幹事們的體諒，則更感到心灰意冷。

也許大家會問，既然上莊是這麼痛苦的一回事，為什麼每年都有那麼多的同學上莊呢？對我而言，上莊的收穫很大，除了可以擴大自己的生活圈子，結識到很多會內外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還可以學習到很多待人處事的道理，更可以學識怎樣分辨是非、解決紛爭等等，這些經驗是極之珍貴的。所以，即使付出了很多寶貴的時間和精神，我仍可以說

一聲「我對上莊無悔」！

在這裡，我想對正在考慮上莊或已決定上莊的同學講幾句肺腑之言：首先，各位必須先想清楚自己是否真的有興趣上莊，如果真的有興趣上莊的話，就應該只抱著一種服務同學的心態和無欲無求的精神，只有這樣，上莊才是一種樂趣，各幹事之間才可以真誠合作，即使將來在工作中遇到多大的壓力和挫折，也可以處之泰然。但如果各位希望透過上莊而取得名與利的話，我勸各位不如集中精神和時間去讀書，爭取 first honor，或找多幾份 part time 會較為化算。

最後，我想藉此機會，對各位幹事說聲「無言感激」，有賴各幹事之表誠合作，使各項活動得以順利完成，無論成功與否，大家總算盡了所能，都可說是問心無愧了。另外，我亦希望各位同學可以積極參予學會的活動，因為每一項活動，都是幹事們廢寢忘餐地策劃出來的，我們的唯一目標就是服務同學。但如果大家覺得學會所舉行的活動有點不盡善的地方，希望大家可以提出多些建議和有建設的批評，使學會的工作得以改善。在這謹祝各位同學有一個充實而又愉快的大專生活。◎



從迎新營說起

■ 羅兆麟

當負責人告訴我，希望我可以寫一篇文章關於迎新營的時候，我毫不考慮地接受了，因為有這樣的機會可以與大家分享一下是很難得的。

對中國研究或者是浸會學院的情懷是由迎新營開始的。它是一個起點，而且是一段非常漫長道路的起點。

迎新營給我的感覺是不錯的，作為給新同學互相認識及更了解這個課程的機會，它的確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雖然很多同學都對這次活動有一些負面的評價，但在我而言，負責活動的同學已經付出不少的努力及精神了。

我剛說過迎新營只是一個起點，因為當我走着這條道路時，遇到一些很令人費解的事情。在這幾月裏我覺到大多的中研同學都有着一份莫名的自卑感，不知道這份自卑感是否因為我們是浸會的「大學生」，或是身為中研人。在一些不知不覺的言談裏，大家都禁不住流露出這份無奈。

無錯，不論是中國研究或是浸會學院都有它們本身的問題，但它們的存在價值是絕無可疑的。總覺得一個人的不快樂往往是因為一些不必要及無意思的比較而產生的。

每個同學都有着他的背景或理由在浸會選讀中國研究，可能是被逼或自願。而我自己抱着的心態就是不論抱着什麼理由，現實告訴我就是每天每時在浸會及中研渡過餘下的三年，我應該盡力去投入及發掘它的優點，可能的話，應藉着它的獨特之處去幫助自己去建立理想。我相信怎樣判斷一個人是成功或失敗就是看他能否把握身邊的事物，及去好好運用它。而在浸會裏是一定可以學到這樣的技能的。

你可能有着成千上萬的理由說浸會及中研怎樣不好，但我不會在這裏作出什麼反駁。我只相信你若能全情投入你現在所擁有的一切，那成千上萬的理由一定不再是理由了，讓我們一起努力吧！◎



最後一年

今年六月，我們中國研究課程將有第一批畢業同學。離別在即，我們的大師兄、大師姐們對於這三年來在漫會的中研生活必有所感……

黃雅麗 經濟三

三年是一段不短的日子，回想三年前，我抱着一個理想來讀中國研究——究竟在過去四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在我的祖國裡攪了什麼鬼？當日我拋下另一條會保証前途不錯的路，毅然踏上中研之路，除了要承受四周不諒解的嘴臉之外，甚至前途也是茫然一片的。人們會奇怪為何在一片移民潮中，我竟會「自動獻身」去研究中國大陸（特別發生了六四事件後，使人對這個課程的信心大跌）。但我堅持的是：人們之所以懼怕中國大陸（特別是中共），是因為大家沒有溝通和了解，加上誇大的想像，使大家的排斥性提高，因此我認為對中國無知的抗拒是無濟於事的，唯有透過認識他們的制度、文化、意識形態才是辦法，畢竟大家都是中國人，應該對統一存有滿心快樂的情緒，什麼「港人治港」、「台獨」都是滋事份子的幻想罷了。

這個堅持也經過了三年的日子，到現在一點也沒有變改，在這個課程中，我雖有很多不滿的地方，但到底「中研」還是小孩子，改變是需要時間的（正如中國的民主化一樣）。但在當中，我得到很多有豐富經驗和知識的老師教導，這是我最大的回報，跟老師和同學的討論給我在思考上有很多啟發，令我更懂得怎樣分析和判斷問題，我很享受這些時間。此外，我有機會在課餘的時候參與一些學生運動和組織，當中有喜有悲，訓練我更成熟的處理事情，特別是人際關係，以及一些課本以外的知識。這些經驗對我來說是極寶貴的。所以，我可以這樣說：我的三年大學生活是沒有白過。

趁此機會，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對一個普遍心態的看法，可能對三級的同學及將來的中研人都有所啟發：我們經常譏笑某講師「無料到」，但請謹記，老師一定會把他最好的知識給予學生的，至於學生是否認同則是另一個問

題，在對別人有要求時，請先問自己：究竟自己盡了本份沒有？在批評別人時也需對自己作出檢討，這樣才會公平些。我想無論是學習或做事，希望以上的一番肺腑之言能對大家有所啟發。在此，謹祝畢業同學前途美好，中研茁壯成長，同學們繼續努力讀書，將來為國家獻上一分力量。

黎劍劍 地理三

回想起一年級的日子，我相信各同學都在沉悶的日子中渡過，而我在一年級的時候，往往因未能適應新環境的情況下，加上人際關係的壓力和學業上的種種問題，整個人無論在學業和情緒上，都受到重重挫折，一年級就在這樣的環境下漫漫地渡過。

經過二年級對環境的重新適應，人亦開朗起來，情緒和學業也開始穩定。及至三年級是我在中研感受最深的一年，這一年對於我來講意義重大，無論在學業成績、人際關係和對中國的認識和了解上，這一年都給予我一個新的突破。

由於三年級課程積分比重十分高，故在力挽狂瀾的情況下，要更加動力才能趕上別人。而在這大前題的驅使下，大家都特別認真和勤奮，經常彼此熱烈討論起來，令我感受到中研真的有點學術氣氛。

而在人際關係方面，在中研的日子長大，人也比較成熟了，不論對人對事，再也不會像以往般偏激。而憤世疾俗的我也變成了一個比較現實的人，除此，也學會了待人處事應有的態度，無論這是好或壞，我相信這是每個人成長必經的階段。

在三年中研的課程中，我對中國的認識和了解也大大加深了，而對中國的一份感情也隨着學習和了解而益形穩固。對中國更存有一份承擔感和使命感，希望將來會為中國作出貢

獻。

最後，黃金時間一般的最後一年，還有三個月就快過去了，吾對未來的中研期望更大，希望現今課程有所改變，使中研課程更益形充實，更適應各同學的需要。第一屆的中研同學將要畢業，為社會服務，而學校生活是暫別還是永別，即視乎個別學而定。在此，衷心祝福四個專業的同学友誼永固，大展鴻圖。

麥榮康 歷史三

要擁有一個成功的大學生活，發展出獨立思考、獨立人格，就必須培養出「三自」精神。

「三自」精神並不是「自私」、「自利」、「自我」，而是「自學」、「自律」及「自愛」。前者是一個失敗的大學生活，後者纔是成功的。

「自學」就是能主動學習，不必老師監督也懂得多看參考書，「自己搵料」補充課堂不足的精神；「自律」是嚴以待己，攻克己身，培養一個有規律的生活，以祈創造有利的學習條件；「自愛」就是重視自己的生命，開放自己，多交朋友，多參與活動，以求一個成熟的人格建立。

環觀身邊的同學，有些很早已掌握了「三自」精神，進步也快；有些很晚纔學到「三自」，進步也晚；更有些到現在也未有「三自」的，就渾渾噩噩的渡過了三年的大學生活。

最後，本人謹祝各位一、二年學友，都有一個成功、愉快的大學生活！

黎耀強 社會三

對我來說，讀中國研究可算是一個偶然。記得小時候立志要當醫生，而在中學的生活亦是沿這條路發展，讀理科、修生物、學創老鼠，準備將來「剖人」，一切都很自然，就算考不到大學，讀了一年理工，亦是和醫學有關的科目。但當發覺自己其實對醫科沒有太大興趣，崇高的理想亦幻滅，便不其然地想轉換環境，中國研究便是這偶然的選擇。因為平日課餘時候讀了不少有關中國的書籍，所以以為自己對中國很了解，便報了這科，而且偏偏選一樣自己毫無組織的專業——社會學。

但三年過後，學到什麼？只感到對中國的

認識越來越模糊，以往簡單的機械式決定論看法、權力鬥爭模式等，當然不足取。但應該建立什麼觀點、角度？我不曉得。而事實上，在中國研究課程內，同學間的中國研究氣氛一點也不濃，我亦不認為這個課程會有什麼太大的美好前景，畢竟，中國研究始終是一支雜牌軍。

不過，我還是要多謝幾位給了我不少知識上啟蒙的老師，雖然他們可能並不認識我，但也無損我對他們的尊敬。

第一位是丘廷亮老師，他的批判思維我當然永遠也學不到，不過如能學到一、兩成已經終身受用——畢竟，了解中國是有很多迷霧需要看穿的。（不過他真的有點吹毛求疵。）

第二位是陳文鴻老師，他的「中國經濟基礎」一科我始終認為是三年內得益最大的一科——畢竟，中國的政策都是有其合理性的。（不過他真的有點親共，但無損於他的認真研究態度。）

第三位是李金強老師，雖然我只上過他四、五堂課，但他使我對中國歷史重新產生了興趣——畢竟，中國歷史還有其生命力的，而且最好能和社會學結合。（不過他說話真是很快，可能是想在最短的時間內把最多的學識教給我們。）

當然還有我的畢業論文導師陸德泉老師，對我的緩慢進度待以萬分忍耐，循循善誘。不過我真的對工業社會學沒多大興趣。

還要感謝各位同學對我的支持、關懷、鼓勵和幫助，使我享受了難忘的三年大專生活，尤其是中研閣各幹事，社會學系和歷史系三年級的同學，我會永遠記住你們。

最後，想用屈原《離騷》中的兩句來作結，以勉勵各師弟師妹們，亦用以自勉。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清華雜記

■ 謝盛昌

那裏的一切一切——河畔的青蛙以至餐廳的「金賢姬」，我們還歷歷在目。嘿！該從那兒說起？清華大學的東門抑或是陳林成教授的歡迎詞？

還記得去年的今日，各專業同學在忘我的精神下密鑼緊鼓地進行籌備工作，迎接「中國研究」課程及同學們第一次到北京清華大學進行的實習課程。

也許是我們——咱們同學、中研課程及大專界的第一次嘗試吧，使同學們以至老師們組織起來時也顯得十分興奮及緊張。我們有鄧佩嫻同學免費提供各類型藥物；有陳英姿的針灸用品；有林毅為首的攝影師團（按：他現已赴發海外）；有盧學榮負責錄像工作，有各專業提供的保安「猛男」以及二位代表各專業的同學等等，絕對充份體現了羣策羣力的精神，無論在分配火車廂床位以至偉倫中心的房間，同學總是擺出一副「顧全大局」、「無所謂」的態度，我們就是這樣順利地踏出邁向清華的第一步。

大清早到達北京火車站時，遠遠便看見陳林成教授愉快的揮動着手上的小旗迎上來。清早的涼意，也就給他的步近而驅散了。可能是外國進口的「麵包車」速度較快吧，我與十數位同學先到達偉倫中心（應為幹訓樓）。從老遠望過去，倒使我有點意外，我們就住在這兒嗎？西班牙式的別墅？

老實說，起初上三個小時的普通話課真不好受，小休時，從半開的房門中，肯定可以看到同學們像躺在床上半死的樣子。不過起初吃早餐的時候，還是人聲鼎沸的，同學們盡量吃個清光，不過，可能是之後的節目太豐富和精彩了，到課程的尾聲時，很多同學實行大規模「打包」上樓，以爭取休息時間。雖然上課時間長，不久大家又在餐廳見面了。「大家姐」、「金賢姬」等送來熱烘烘的「滷菜」的情景，有沒有點「逆來順受」的感覺呢？太陽仍在窗外呆呆向着我們的時候，我們已經在餐廳內戰戰兢兢的又再接受挑戰了。經過多

番考驗後，有的同學仍能保持原有的體態，不過「牛奶」肯定是其中一個「失敗」者，還說吃不夠？這番說話在晚上經常聽到。這倒也不奇怪，因為晚飯真的吃得早了一點吧。解決的方法挺多：「大學生之家」應可幫我們一個大忙，那兒的「方便麵」貨源充足，不愁賣光。覺得它不夠吸引的同學多得很，我便是其中的一個。南門的韓國風味小菜館則較吸引，味道好，價錢平不在話下，而且「風光旖旎」，我還經常碰到不少到此宵夜後樂而忘返的同學呢！

一些腳踏自行車的同學，相信已飽覽了清華大學的校園景色。不懂的，步行雖然較慢，但在晚飯後與三兩知己迎着清風在柳樹蔭、梧桐下慢步，卻是另一番的情趣。還記得大禮堂面前的大草坪嗎？清華同學們悠閒、寫意的在翠綠的草坪上休息、嬉戲；以及日落時份、雙雙出現的麗影，怎不教人眷戀呢？騎自行車從大禮堂往東走，兩旁高高矗立着，披着褐綠色外衣的榆樹，使我感到有點像在巨人的腳縫中穿過一樣，顯得有點卑微及驚險。再往東走，一個偌大的東門廣場頓即在我們眼前出現，這裡的主樓不知「謀殺」了我們多少「菲林」。聽謝志成教授說這座主樓是在五十年代中蘇友好時候興建的，怪不得充滿蘇俄味道。看罷清華園的工字廳、水木清華、丙所、自清亭等等後，或者看罷北大的「一塔湖園」、又或者到中關村搜購完，向着干訓樓

踏上歸途時，口裏總會有點乾澀，大家每每都被幾毛錢一斤的西瓜吸引。晚上實行來個西瓜宴，吃過飽，以解暑氣。另外以「鬼佬涼茶」解暑的同學亦多不勝數。「大衛」、「阿牛」、「珠珠」你們喝多少才夠呢？五十？一百？佩服！佩服！「阿翁」你剩載「涼茶」的背囊穿了沒有？我們這個盛大、壯觀的豪飲場面，我是絕不會忘記的。再來一次行嗎？

興奮的晚上過後，使人意外的是，大家雖遲了少許進課室，但總是能夠出現的，而且亦已開始習慣下來。下午的專題講座，出席率亦直線上升，更沒有倒下的睡姿，大家好像很專心的在「筆錄」，看講稿。最失敗的就是我們的掌聲往往慢了半拍，也許是我們太專心吧！

茶餘飯後，有益身心的消遣當然是踢足球，既是集體遊戲，又可與清華同學交流，可說是一舉兩得。有否記起我們在球場上經常像小孩一樣奔馳的課程主任李博士？他的一記「倒掛」，連胡老師也報以喜悅之笑容——以

茲鼓勵。而激烈的球賽更吸引了不少女同學來觀戰呢！中研同學除了有合作精神外，對華東水災的災民亦有強烈的國家民族感情，在盤川極短缺的情況下，各同學亦能盡力捐輸，捐款雖然不多，但我們的心意，相信能抵香港的熱烈情景。

無論是初次到北京的，或是已到過幾遍的同學，除了到附近的中國書店外，相信也曾到過要坐375路公車「出城」再轉地鐵才到的王府井新華書店了。大家一拐一拐出來，替我們書架上增添了不少「藏書」。紀念品當然少不了，琉璃廠、王府井等地也曾留下不少我們的足蹟。好些同學也就連中關村的也不放過。不過你有否覺得中關村刻圖章真的比較便宜一點呢？

有一處是我們不能買到，只能親臨其中，或將其優美處透過相片保留下來的，這就是偉倫中心面有「荷塘月色」之稱的近春園遺址的公園了。剛到步的時候，荷花池的荷花仍是沒睡醒似的。後經我們每晚在這醉人的柳岸旁盼望下，她們終於在我們離

開前爭相展覽她們的美態及發放芬芳的花香，又像是提示我們是到拍照的時候了。說到拍照，我經常給人家「撈呀」，不知有沒有你的份兒呢？至於「阿團」、「貝莉」、「阿釗」、鍾謙、「李奧」等肯定是「撈家」，我想你們也不會否認吧！

短短五個星期的時間裡，先後得到謝校長、社科院院長、各老師們的多番探問，使我們有點受寵若驚之感。胡老師對我們設切的關心，決非我的筆墨所能形容，我們只能把這分心意銘記於心，作個無聲的感謝了。清華老師們對我們如父母般的關心和照顧，荷塘的月色、南門的小吃、「大家姐」的風采，這一切一切雖然不能盡列及帶走，但我們是絕不會忘記的。



學 林 野 史

■ 吳系我

一個炎熱的下午。

無風、無雲、只有烈日。

浸會縣的廣場上人煙稀少；其餘的人在冷氣間內「夏眠」。

那偌大的廣場，寂靜得令人沉睡的氣氛，忽被一聲嘆息所驚破。

「唉！唉！唉！」小丙這樣嘆息了很久，連樹上的麻雀也給他悶走了。

在旁的大明終於忍不住問：「小丙師弟！你在呻吟着吧？」

「師兄，不要說得這樣難聽啦！」

「否則，你一定是肚痛，不用怕，我有修哥果隻「喇叭牌」正露丸呀！食兩粒啦！」

「師兄！」小丙回答：「我不是肚子痛，而是我投入浸會縣中研派後，一直都唔知自己做乜。」

「莫非師弟難過美人關？」大明緊張地問：「哪一位師妹呀？我幫你宣揚出去啦！」

「難過美人關又不錯㗎！」小丙又嘆息地說：「可惜不是呢！唉！」

「究竟甚麼事呢？」

「總言之一言難盡啦！」

「但你說了很久，仍未說到正題，當然難盡啦！」

「唉！實不相瞞，那是關於中研派的！」

「莫非你發現本派的不可告人之秘密？是不是四位專業長老另有「秘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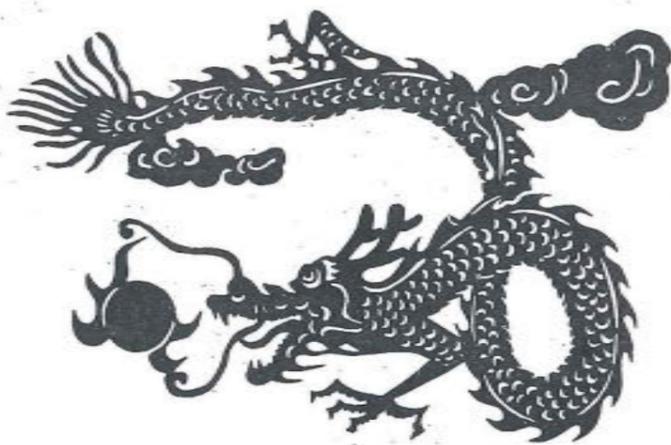
「大明師兄，別再胡鬧吧！好嗎？」小丙開始生氣了。大明知道大事不妙，只好把剩下來的玩笑吞下肚子裡去。

「師弟！究竟發生甚麼事？」

「師兄！你知道我們中研派的武功，好像是東拉西扯，炒埋一碟。例如我是去習歷史內功的，但仍須練經濟心法、地理真經、統計大法、社會十八式等等，這樣我尚算是歷史人嗎？」

大明聽完此番牢騷後，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師兄，你還笑我……」



突然，一片刀光劍影，打斷了大明的笑聲。有兩個黑影，從遠處閃過來，正向他們偷襲。

說時遲，那時快，大明和小丙拔劍而起，使出「史學劍法」還以顏色。三招過後，大明忽道：「港島歷史七式？」

黑衣人甲道：「你的眼界倒不差，知道這是港島歷史七式。」

「不只是港島的，更有馬料水的史學金手指啊！」小丙的額角滲出點點的汗珠，因他知道勁敵已來了。

「既然知道我們是誰，還不快快叩頭？或者可以留你們一條眉毛，哈！哈！哈！」

「欺人太甚啦！」小丙呼號着：「我們中研派雖然是窮，但我們有骨氣，決不苟且偷生的！」

「講骨氣？」黑衣人乙道：「看吧！史料幻魔拳！」

在小丙面前，出現了幾十份史料，不知道哪份才是正確的。「怎麼辦呢？」似乎小丙遇上了勁敵，他忽然不知所措，竟呆呆地站着不動。

「看吧！史料鑑別拳！」大明突然撲出，拳風之厲害，使所有「流弊」都消失了，獨剩黑衣人乙，應聲倒臥在地上。

「師兄！」小丙感激地說。

「師弟！我們的史學基本功是不差的，對付這些嘍囉鼠輩是卓卓有餘的！」

「我當真做得到？」小丙高興地問。

「當真！」

跟着，他們拿起揚聲器來，合唱：「我，我做得到……」

黑衣人甲甚不耐煩，說：「廢話少講，快接招！」跟着，使出他的本門絕學——斷代史拳及古代史腿，以求擊倒小丙。

「怎麼？他這幾招似乎很厲害！」小丙心想：「怎樣才可破解呢？」他漸處於劣勢了。

大明忽然在旁呼喊：「以己之長、攻彼之短。」

此一言驚醒了小丙，遂左一招「中國經濟」，右一招「現代中國思潮」，把黑衣人甲的衣服片片削下。

「你好賴！」黑衣人甲投訴：「你出怪招！」



「尚未算！」小丙道：「接招啦！清朝皇帝平均有多少個兒子？」

「這是數學招數嗎？」

「不！這是統計、中史及搞笑混合而成的！」

「我唔打啦！」黑衣人甲丟下劍來：「你玩我！」

「還有一招，」小丙得意地說：「看浸會的絕招「全人教育法」啦！」

忽然天昏地暗，乾坤倒轉，霜雪驟至，木葉盡脫，雞飛狗走……嚇得黑衣人甲涕淚交接。

「我認輸啦！」黑衣人甲挾起暈倒的黑衣人乙說：「我走，回去叫我師父五金佬來收拾你們。」說罷便跳入草叢中逃走了。

小丙高興地道：「師兄，原來我們中研派的武功是如此了得的。為甚麼不早一點告訴我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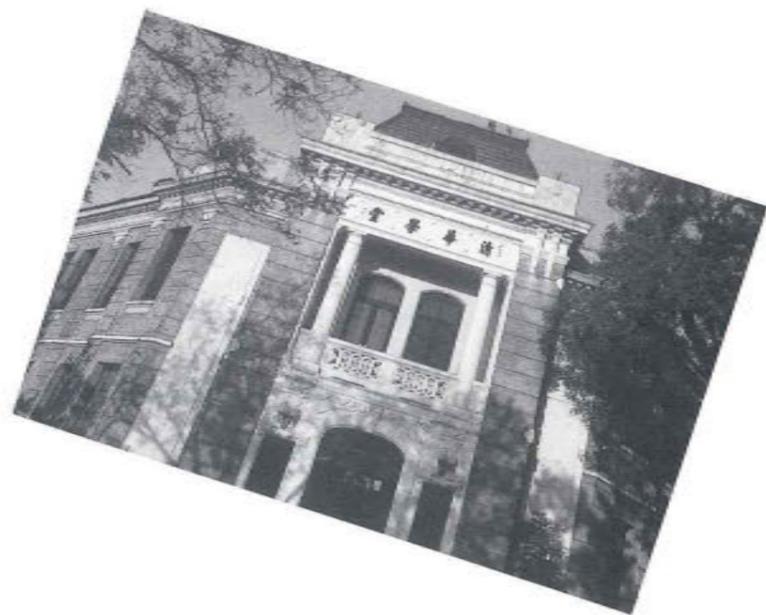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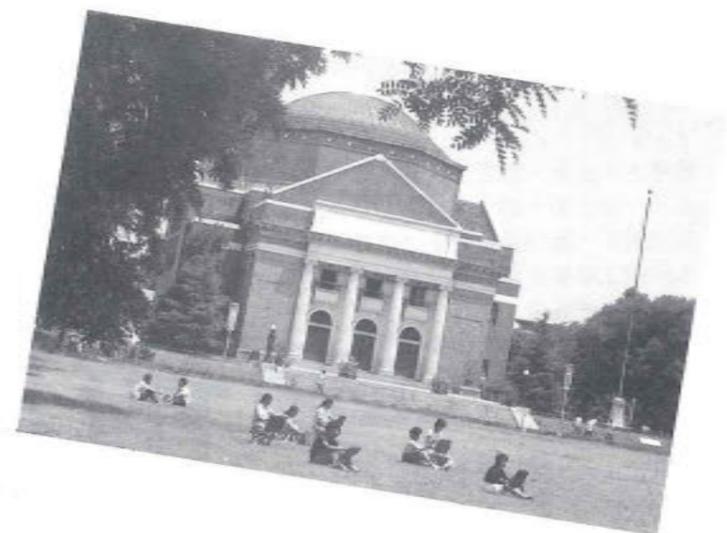
大明回答：「師弟，那你又錯了！」

「甚麼？」

「只因我們的招數古怪，令其他們打不過我們罷了。」

「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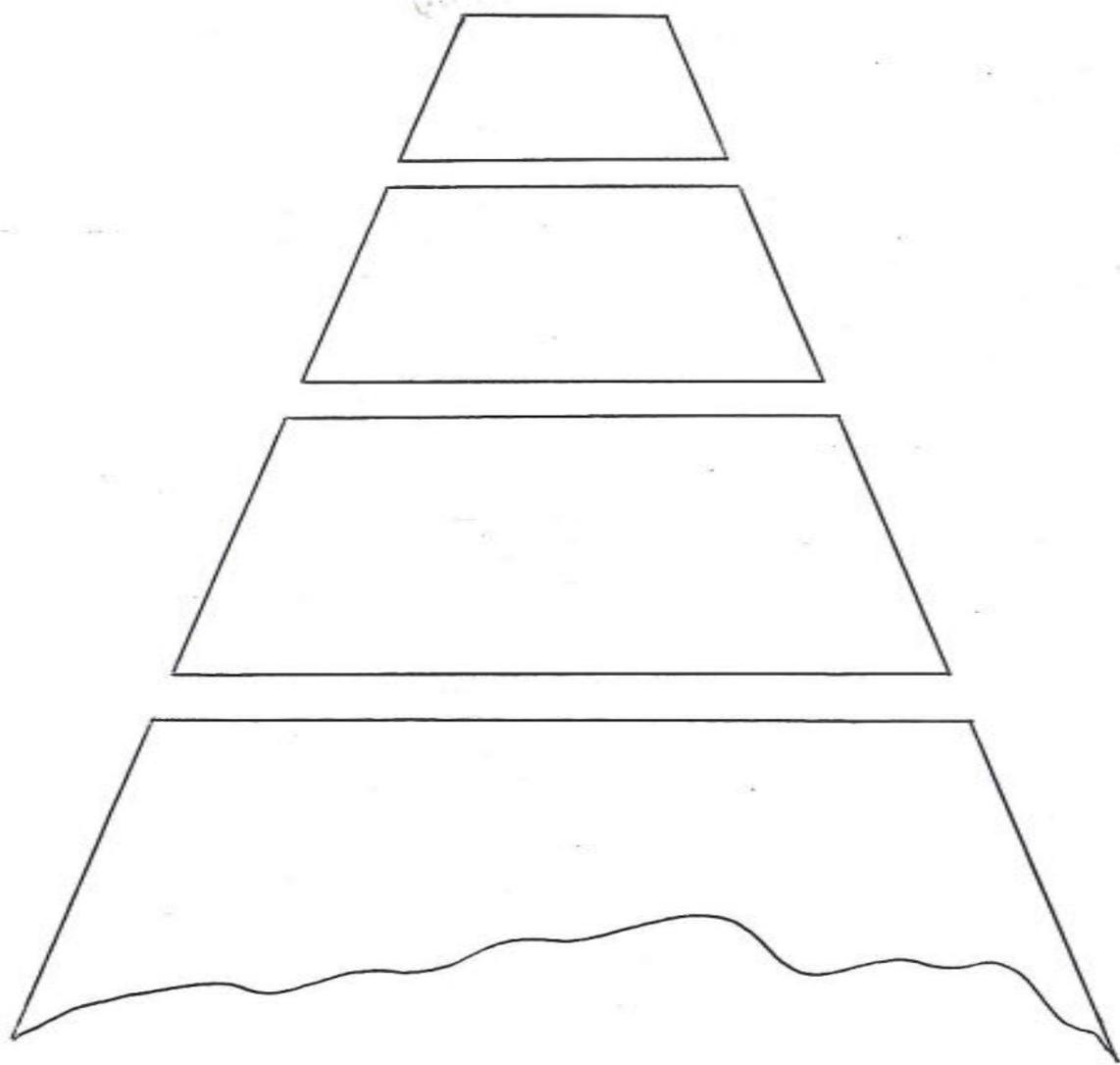
「本故事純屬搞笑，如有雷同，實屬不幸」



試論國營企業的目標及其行爲^①

■ 黃國 (經濟二)

學術版



前言

著名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科爾內就曾指出，社會主義企業的軟預算約束，是造成經濟短缺的主要原因，而軟預算約束又是由於國家的「父愛主義」所造成。然而，中國企業的軟預算約束具體表現在消費基金膨脹和外延擴大再生產投資衝動兩方面。致使中央爲了保持一定的積累率 and 滿足各方面的利益，被迫通過「貨幣再分配」的辦法實現，於是便發生通貨膨脹^②。而本文是試圖分析造成企業在軟預算約束下消費基金膨脹和投資膨脹的形成原因及其影響。

一、軟預算約束和父愛主義的概念

科爾內在研究社會主義企業的行爲中，首先提出軟預算約束的概念。就是企業可以通過政府給予價格、信貸、投資、稅務等方面的優惠，甚至在虧損時還可得到國家無償援助而不致於倒閉。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生存、發展不在於企業的經營好壞，而是在於從國家手中得到多少好處。將企業應獨自承擔的風險通過提價方式轉嫁在消費者身上或以貸款形成轉嫁給國家。因此，軟預算約束和硬預算約束有所不同，它不能起有效的行爲約束的作用而僅僅成爲一種會計關係^③。

而「父愛主義」則意味着絕對的保護和安全，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經濟關係。換言之，國家以父愛主義方式幫助蒙受損失和破產威脅的企業，對它們提供國家担保，條件優惠的貸款、免稅、甚至直接的財政資助。從而造成企業對物資、勞力幾乎無止境的需求和囤積，對投資無限的渴望等等^④。

現在，我們試從實証的角度出發，首先通過對企業目標及其行爲之間的關係分析，探討它們的互爲影響因素。在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⑤中，決定了全面推行企業改革，使之成爲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的經濟實體。爲了配合企業改革，還進一步擴大國營企

業主權，在計劃、銷售、價格、資金、人事等十方面進行改革，簡稱「放權十條」^⑥。但企業還保留着對政府一定程度的依賴，這使到企業既關注自身的發展，又注重企業職工的收入和福利，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服從上級領導機關的偏好。因此，企業經常隨着外在因素的影響，在三者之間作出平衡。

二、企業目標——職工收入最大化

在公有制關係中，任何一個人，都既是所有者，因爲從法律意義上每人都是企業的所有者，但又不能根據這種特殊的所有權索取總收入中的任何一個特殊份額，構成公有制關係中個人的二重規定性^⑦。使企業客觀上不可能產生內發的代表所有者利益的行爲動機。相反，在企業內部，職工的獨立利益反而得到強化，影響企業決策。廠長（經理）由代表國家和企業變爲更多地代表職工的利益。因爲企業既是經濟活動的重要資源——信息的壟斷者，又是國家決策的實際執行者，使它表面上看起來像任國家擺佈的「小卒」，實際上卻是能按自己意願影響國家決策的「相士」。同時，在國營企業中，職工與經理的經濟地位是平等的，故表面上經理指揮職工，實際上職工支配經理。經理對「向主管部門或職能部門匯報的信息的選擇」，實際上就是以職工利益爲依據，而企業的國家決策的影響，實質上反映了職工的意志^⑧。還有，國家實際再分配的稅率高，據估計，約佔企業利潤的80%。遠高於標準稅率55%。因此利潤越高，上繳就越多，反之，利潤越低，獲得的優惠就越大。造成「幹什麼都不如與政府部門進行討價還價。」

在追求職工收入最大化的企業目標之下，導致企業通過提高價格將成本轉嫁於消費者身上，還有攀比心理和消費基金擠佔企業生產發展基金等行爲。首先在〈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中作出明確決定，企業可以在不高於或低於20%幅度內協商定價。以後爲了鼓勵企業發展新產品，允許對

新產品有自由定價權。而且在短缺經濟下形成的賣方市場，企業可以通過提高價格獲取利潤，從而增加職工收入。在對湖南省機械行業75個大中型國營企業的調查中，就發現大多數企業的產品提價對其利潤的貢獻都在 $\frac{1}{2}$ 以上，最高的是其利潤3倍，反映了由於市場的不健全，壟斷和行政的干預，以致企業有能力左右價格^⑨。

其次，就是攀比心理。由於企業經營條件的差別，以致企業有能力和國家進行討價還價。例如，不同的企業規模，無償佔用固定資產就不同，而在一般情況下，經濟效益往往同企業規模成正比。同時，加上價格扭曲，故銷售條件及其利潤率就不能反映經營水平。另外，產業政策的不合理和人才的自由流動受到限制，使到企業付出相等的努力程度，也難以得到同等的經濟效率。這些原因成為企業與國家討價還價的本錢。而這種不均等競爭帶來的不均等收入分配，其結果必然刺激企業在收入上攀比。而那些勞動生產率低，效益差的企業往往寧願犧牲利潤和發展來增加職工收入，以保持與勞動生產率高，效益好的企業的職工收入相等。也就是說，是一種橫向攀比行為機制在支配企業自主的收入調節。

最後，職工收入的最大化擠佔了生意發展基金。按國家規定，生產發展基金，職工獎勵基金，集體福利基金佔企業留利分別為60%，20%，20%。而在追求職工收入最大化的企業目標下，據對湖南省大中型企業調查中，有 $\frac{1}{3}$ 的企業將留利全部用於獎勵福利基金，而其餘的 $\frac{2}{3}$ 的企業則將七成以上的利潤用於獎勵福利基金^⑩。而在另一個調查中，企業平均用於獎勵福利基金都超過了六成，說明企業為了增加職工收入，不惜犧牲企業的發展^⑪，造成「工資侵蝕利潤」，從全國來看，職工平均工資增長幅度超過了勞動生產率提高幅度。中國職工的每年平均工資，1987年為614元，到1986年為1,148元，增長了116.4%，然而勞動生產率於1978年為11,131元，升到1986年的21,445元，增幅只有92.6%，而且實物分配還沒有計算在工資之內^⑫，無形中削弱了自身的資本累積。唯有將投資所需資金的包袱拋向政府。是在軟預算約束下，企業追求職工收入最大化的行為表現。

三、擴大外延生產能力目標

企業在追求職工收入最大化的同時，還要受到國家目標的約束。為了完成國家指標，諸如利潤增長率、資金盈利率等經濟指標，通常有兩條途徑，即挖掘原有生產能力和增加新的生產能力。但如果挖掘原有生產能力意味着增加廠長和職工的勞動強度，而在軟預算約束之下，又那麼容易獲得政府資金投資，相比之下，企業自然傾向追求增加新的生產能力，造成所謂「投資衝動」。

而信貸資金對地方政府的軟約束、稅前還貸政策和預算外資金，是導致投資衝動的主要原因。第一，信貸資金對地方政府的軟約束。雖然專業銀行本來歸國家所有，但由於地方對基層銀行行長的任免上有影響力。而且基層銀行在解決具體問題上，例如銀行選址、住宅建設、子女上學與就業等都需要地方政府的幫助。另外，各基層銀行貸款指標，更需依賴地方政府與上級談判的結果。除此之外，銀行出於自身利益，擴大對地方企業貸，不單可以促進地方經濟發展。還有利於增加信貸資金來源和將來貸款的回收，提高職工和家屬收入水平^⑬。正如樊剛在《大綱》中所說：「地方銀行實際隸屬於地方經濟當局」，是貨幣供給失控的基本原因。

第二，稅前還貸政策。從81年開實行「撥改貸」政策，雖然企業從此向銀行借款既須還本，又要付息，應可約束企業的投資衝動。但由於企業可以在稅前還貸，同時加上高稅率政策，大中型企業所得稅為55%，增長利潤減徵調節稅比例為70%。經過計算，還貸資金中，國家負擔將近70%，而企業不到 $\frac{1}{3}$ ，實質上不過是國家撥款或國家投資的轉化形成^⑭。再加上貸款利率偏低，遠低於通脹率，出現負利率，在「不借白不借」情況下，自然容易引起信貸失控，導致經濟過熱。

第三，預算外資金。由於政府「放權讓利」政策，企業根據「你有政策，我有對策」的辦法，利用價格，成本，稅收等方面的空隙，轉嫁所應承受的負擔，從而獲取預算外資金。因此之故，它由1980年的65.9億增加致1985年的244.8億元，增幅達2.7倍。同時，預算外資金增加引致的投資衝動並不在於短綫部門，而是投入「短、平、快」的加工工業，導致投資結構惡化^⑮，進一步引致產業結構失

衡，造成瓶頸，嚴重制約整個經濟發展，是中國結構性通貨膨脹主因之一。

由於企業追求擴大新的生產能力的投資衝動致使生產能力的大量剩餘。例如江西化纖廠，生產能力在1971年就已達到10,000噸，但近年來平均產量只有8,260噸，始終沒有能達到應有設計能力。而另一間福建機器廠的設備利用情況，以最高的月份計算，亦只有生產能力的45.8%^⑯。由此可見，投資衝動與生產能力剩餘在軟預算約束下並存。

同時，忽略了對企業的挖潛工作，沒有更新和改造舊裝備，充份發揮原有生產能力，導致企業設備更新而不換代，生產技術停滯不前。對於大量的陳舊設備，老化的工藝和落後的技術，一方面缺乏維修能力，技術上不能用的固定資產堆積越來越多，使資產損耗和生產能力下降。另一方面引致設備使用成本的增加以及現有生產中勞力、物資和能源投入量的增加，降低了經濟效益^⑰。

四、對科爾內「父愛主義」的一點商榷

從上述分析國營企業在軟預算約束下追求職工收入最大化及外延擴大生產能力的再投資目標的形成，以及在這兩種目標企業的具體行為，都充份說明了企業的軟預算約束並非如科爾內所說的「父愛主義」所造成。中國的經驗顯示企業擁有很大討價還價能力，甚至有時候還可以控制主管部門。企業在國家目標與職工目標之間，往往傾向於後者，除非由於政治氣候的轉變，中央重新集權，實行嚴勵經濟緊縮政策。否則，職工的目標必然置於國家目標之上，後者反而同為企業追求職工目標的制約。國家與企業關係並非如科爾內所述，是父親與兒子的由上而下的關係，是保護者與被保護者的關係，而是兩個有差不多相同力量的利益主體的策略性行為（strategic behaviour）造成企業的軟預算約束。故對科爾內「父愛主義」的概念應加以補充新材料，才能有效解釋中國國營企業的軟預算約束成因。^⑱



注釋

- ① 本文是根據兩個調查的資料，從實証的角度分析企業在軟預算約束下的行為。張波、左翊：《目標結構、預算約束與企業行為》（《走向未來》總第3期）。趙素英：《經濟體制改革的企業行為》（《改革：我們面臨的問題與思路》經濟管理出版社1986）。
- ② 樊剛稱這種通脹為「摩擦性通貨膨脹」，見：《改革、通貨脹與國有制的固有矛盾》（《經濟學國報》89年1月22日）。
- ③ 科爾內：《軟硬預算約束》（《矛盾與困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 ④ 科爾內：《短缺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0第二十二章。
- ⑤ 《人民日報》84年10月21日。
- ⑥ 《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人民日報》84年5月12日）。
- ⑦ 樊剛等：《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上海三聯書店1990第二章。
- ⑧ 潘振民、羅首初：《社會主義微觀經濟均衡論》上海三聯書店1988第三章。
- ⑨⑩⑪ 張波、左翊 同注1。
- ⑫⑬⑭ 趙素英 同注1。
- ⑮ 戴國長、黎漢明：《工資侵蝕利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潛在危險》（《經濟研究》88年6月）。
- ⑯ 鍾朋榮、吳同虎：《宏觀經濟論》經濟科學出版社1990頁22。
- ⑰ 鄧英洵等：《中國預算外資金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頁23，第四章。

淺談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及實踐

■ 塵哀（歷史二）

一：引言

若翻看近代的中國歷史，相信大家都會承認周恩來不單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及無產階級革命家，更是一個學世公認的傑出外交家。由於解放後的中國是新式社會主義國家，這樣的國家搞外交，必然遇上很多特殊的困難。固舊的中國外交固不可學，西方資本主義外交只能涉取部份以作參考，即使蘇聯的外交也只能選取一部份。故周恩來以毛澤東的革命外交路線和政策，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團結其他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並以反帝國主義、反修正主義及反霸權主義為外交思想的總路線。事實上，周氏那貫穿愛國主義及國際主義的外交思想，對新中國與國際的關係有極深遠的影響。本文嘗試就有限的篇幅，窺探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及實踐。

二：獨立自主的外交

周恩來本着獨立自主的精神與各國建立外交關係。首先，新中國不承認國民黨在大陸時期之外交關係，不承認其與外國所締結的賣國條約及外國在華開辦的經濟及文化事業之擁有權等。周恩來認為新中國雖願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其他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建立外交關係。但面對以美國為首（第一世界）的帝國主義，中國是不急於與這些國家建交的。正如周恩來在建國前夕就指出：「如果我們急於要求這些國家承認，就會陷於被動。」對於美國支持蔣介石的台灣政權及企圖製造「兩個中國」及「一中一台」等活動，周恩來是堅決反對的。雖然他早在一九五四年就公開宣告中國願意與美國和平共處，但美國在60年代未始改變其對華政策，而周的獨立自主外交正表現於一九七二年改善中美關係的《上海公報》上，周恩來要求公報稿不單講共同點，也講分歧處，打破舊日只講共認的《聯合公報》而隨着美國與台斷交、廢「美蔣條約」及美軍撤台等等，令中美關係終於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建立起來。

對於日本這個第二世界的國家，周氏認為第二世界有壓迫及剝削第三世界，但它們本身

也受到美蘇等超級大國所壓迫及威脅。故在中日關係上，中國要求日本在承認新中國為唯一合法政府，承認台灣也是新中國的領土及廢除「日台條約」的三項原則下，與華在七二年九月正式建交。可見中國與他國建交時，都在台灣問題上堅持自己獨立自主的原則。

至於與社會主義老大哥蘇聯的關係，周恩來仍然堅持獨立自主的立場，並說：「即使對於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我們也不能夠有依賴之心。」認為中國在戰略上雖與蘇聯合，但也要有批評而免受對方控制。正如周恩來在強調聯合與蘇聯在戰略上聯合的同時也批判蘇聯在二次大戰後的大國沙文主義及霸權主義。

在獨立自主的思想下，凡與中國建交的國家都要支持新中國為合法政府及支持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隨着周恩來主管外交期間，由中美交惡轉為中美交好；由中蘇交好轉為中蘇交惡。可見周恩來那獨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在這瞬息萬變的世界中，令中國的外交幸免於依賴超級大國之扼運。

三：愛憎分明及言出必行的外交。

周恩來認為中國要站在被壓迫、被侵略的國家和民族那邊，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鬥爭。故新中國不斷支援朝鮮、越南、柬埔寨及老撾的抗美戰爭。此外，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毫不諱言朝鮮問題不能和平解決與美國在遠東的擴張政策不無關係。而他更力斥美國想利用南越作為反對中國之軍事基地。其次，周氏雖與蘇共及越共站在同一陣線，但仍同意老撾和柬埔寨獨立於越南，以堅持中國對民族及國家自主獨立的主張。這使有助結束法國與越共在印支地區之戰爭。而自一九五六年後，蘇共在赫魯曉夫及勃列日涅夫的領導下，也不斷向波蘭、匈牙利及捷克擴張，甚至在一九六九年在華挑起珍寶島的衝突等。周恩來不單當面指責，並批判蘇聯為社會帝國主義，而且更不畏艱險訪問波、匈兩國。可見其伸張正義、不畏強暴及支持弱小的新中國外

交思想。

在周恩來領導下之中國外交堅決履行自己對別國的承諾，正如周恩來給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寫下了「言必信，行必果」六字格言。而他更時常引用毛澤東來兩句話：「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屍還」來鼓勵外交人員處事要言而有信。如在韓戰時，周恩來就發表了《為鞏固和發展人民的勝利而奮鬥》的文章中表明不能聽任美國對中國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故中國最後也參予「抗美援朝」的戰爭。而中蘇在決裂前中國欠下蘇聯的外債，在六十年代的經濟困難時期，仍能償還債務。終於在一九六四年，由周恩來宣佈中國已還清欠下蘇聯的債務。而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也在回憶錄中說：「至少在和我們的接觸當中，中國外交家證明是完全可靠的。」這些事正好引証周恩來那「言出必行」的外交風格。

四：求同存異及平等待人的外交

按周恩來的解釋，「求同存異」是把各國之制度、意識形態的不同及爭端放在一邊，而按照周在中印邊境談判時提出的五項原則之基礎上找共同點，以求得無論在雙邊或多邊問題及外交關係上之和平共處。在一九五三年底，周恩來於中印談判中首先提出「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當時印度政府的贊同。其後印緬兩國與中國共同把五項原則作為適用於一般國際關係的原則而加以倡導，令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國際公認的外交關係準則。此外，在一九五五年亞洲及非洲廿九個國家在萬隆召開亞非會議。這在沒有美蘇等超級大國下，由決心掌握自己命運的國家第一次召開國際會議，共同商討國際局勢。中國這個新興社會主義國家也由周恩來率領代表團參加會議。但在會議開始的第一天（四月十八日），已有別國代表提出共產主義威脅、顛覆活動及宗教信仰自由等社會制度及意識形態的問題，把矛頭指向中國，從而令會議氣氛一度緊張。翌日，為了令其他國家釋疑，周恩來臨時決定將原來的發言改用書面散發，並利用休會時間，在會場親自起草補充發言，寫出一頁就送出一頁譯成外文，在下午的會議時，周恩來「求同存異」的方針，駁斥了別國對中國的懷疑，他說：「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

吵架的。」並指出在會議上大家應該求同而不是求異，而大家之共同處在於自近代以來都遭受過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故應以解除殖民主義之威脅為共同基礎。這次會議對促進中國與亞、非各國之友好合作關係邁出一大步，而會議也決定以周恩來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制定了著名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可見「求同存異」的外交思想正為中國邁向國際舞臺的道路上，避免不少障礙。

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也提出平等待人的外交思想。認為國家大小一律平等，並且以中國作為例子：「由於歷史的傳統，大國容易對小國忽視和不尊重」。他甚至請求到會代表若覺得中國代表團不尊重任何國家，便可當面指責而讓中國代表加以檢討並改正。周恩來時常與外賓傾談這個主題，避免中國走向大國沙文主義的道路。甚至美國乒乓球隊員以平民身份向他求教對「嬉皮士」運動的評價時，周也站在平等的地位上進行交談，沒有半點強加於人的生硬說教。這種思想也應用到輸出革命的同一題上，中國雖然相信社會主義革命一定勝利，但站在尊重別國的獨立和主權下，堅決不對外輸出革命，認為人民選擇甚麼制度，國家便會產生甚麼度，這決不能由別國人民來決定的，這就是新中國堅持的求同存異，平等待人的外交思想。

五：實事求是的勤儉外交

新中國的外交也講求實事求是地處理問題，為了解決爭論已久的中緬邊境問題，周恩來不惜翻查自漢朝以來有關的歷史文獻，弄清中國歷代對中緬邊境地區之管轄情況。並搜集各種地圖，以求弄清各時期畫法不同之原因。他甚至調查自十九世紀以來有關雙方在邊界上之糾紛及交涉經過，甚至研究雙方居民在當地之分佈及生活情況，更參考有關邊界問題的國際慣例。最後總結研究所得而提出一既考慮歷史，又考慮當前局勢的方案，終於完滿解決雙方的邊界問題。而周恩來那實事求是的態度更表現於一九六七年八月的「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當時林彪及江青等煽動極左思潮而激發人民火燒英代辦處。周恩來知道這次中國理虧，故除了多次作嚴厲的批評並向英國政府道歉外，並負擔維修英代辦處的費用。對於一些外國人在文革時期受辱，周恩來得之後往往

也會當面道歉。

周恩來那實事求是的作風也表現於對事物分析的透徹性。對於蘇聯在六十年代初撤走全部在華專家一事，周雖強加遣責，但對於五十年代蘇專家對華之貢獻，特別是興建長江大橋一事，卻給予了肯定的評價，可見他把實事求是的精神運用於國際關係上，形成一鮮明的外交政策。

在進行外交活動時，周恩來經常強調要辦「勤儉外交」反對講闊氣，擺排場及鋪張浪費的作風，遇上外賓到農村參觀，必指示不要為外賓在城市訂做飯菜，只須用當地的土產及方法做飯菜款待外賓便可。對於駐外使館官邸過於豪華，周恩來也經常提出批評。此外，他不容許任何假公濟私的情況出現，如他曾明確地立下一條規定，凡是以他個人以「國務院總理」的名義給外賓贈送的禮物，盡管是出於工作的需要，都應由他自己討錢，決不動用公款。盡管我們不能否認以勤儉辦外交，多少與國家的經濟情況有關，但他不因私而忘公，那為國為民之情也可見一斑。

六：友誼外交

基於爭取和平是新中國外交的首要目標，要達到這個目標，莫過於發展友誼外交，正如周恩來曾經指出：「我們需要和平，我們需要朋友。」認為與無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人民往來，將會促進官方友好關係的建立，中美的乒乓外交便是很好的例子。而中日關係之正常化也有賴於建國以來，每年來華的日本各階層人士，一直為來訪各國外賓之首。這些人士對中日關係正常化起了重要的作用，故周恩來也以「飲水不忘掘井人」作為對促進中日友好而努力的日本朋友的極大敬意。

周恩來在外交上之成功也有賴於他與各國政要廣結友誼。如他在六三至六四年間往加納作友好訪問，但在他到達加納前夕，竟發生了謀刺恩克魯瑪總統事件。而周恩來為了總統的安全，除了打破禮賓的常規，主動建議所有與總統有關的活動皆在總統府進行外，也不必總統到機場迎送。他這些舉動贏得加納人民及各國的讚賞。對於「海外華人問題」，為了避免華僑被歧視及破壞中國的對外關係，周恩來除了堅決表示中國永不當帝國主義者外，並準備放棄兒童國籍取決於父母國籍的慣例，勸說約一千二百萬華僑要尊重所在國之法律與習俗。而周恩來對華僑問題之做法，不單令各國對華

之擴張舉動釋疑，也帶領中國人開始理解種族和國籍的差別。

七：總結

總結而言，周恩來無論作為總理（自一九五四年開始）及兼任對交部長（一九五四—一九五八年），他的外交政策也正足代表當時新中國的外交政策。而他的外交政策又經常受到國內局勢及毛澤東思想所影響。而我們應該明白在沒有道德可言的國際關係上，太過強調愛憎分明及友誼外交是否恰當！而求同存異的方針只強調共認，卻沒有對相異處提出意見。而周恩來也不是神，也不能單靠外交解決問題，如六十年代的中印邊界問題，周恩來雖親赴新德里，尋求大家的共識，可惜也不能避免六二年時的中印邊境衝突。

周恩來的外交思想精闢有理，外交實踐多姿多采。由於筆者的學術水平有限，對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及實踐只能作以偏蓋全的論述。面對當前社會主義國家紛崩離析的情況，中國外交一向所倡導的獨立自主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否仍切合現今的世？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企望有志之士在這問題上能多加探討。

參考資料：

- ① 許芥是：《周恩來傳》，香港：明報出版部，一九七六年。
- ② 《周恩來的一生資料選輯》，香港：新中國書公司，一九七七年四月。
- ③ 《世界偉人周恩來—各國人士的記述和回憶》，香港：利博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三月。
- ④ 馬列 王凝：《周恩來同志所倡導和體現的新中國外交風格》《周恩來研究文選》，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頁510-514。
- ⑤ 魏史言：《對周恩來外交思想的初步探討》《周恩來所研究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頁549-561。
- ⑥ 謝冰心等：《周總理大勇大智事蹟記》，《周總理的故事》，香港：香港朝陽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四月，頁1-6。
- ⑦ 邵年約寫：《高舉團結反帝的旗幟》，《周總理的故事》，北京：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一九七七年，頁98-103。

國家、民間社會、社會運動概念的關係

■ 荆楚（社會二）

八十年代對於台灣人來說是一個急劇變遷的年代。隨着威權統治的鬆動，戒嚴體制的解除與及強人政治的結束，在政治上、社會上均出現「自由化」、「民主化」①等現象。這顯示出台灣的政治與社會文化、規範與制度正經歷着「解體與再結構」的過程②。這個「解體與再結構」的過程，包括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重新釐定、社會政策與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關係的形構；更重要的是在這種社會再結構的過程中建構新的、合理的價值規範與制度結構，藉以維繫社會大眾於一個多元中心的社會秩序與社會典範內③。台灣社會運動的湧現，正是這個茁長中的多元化民間社會的活動力表徵。

社會運動

八六年台灣正式解嚴，過往被壓制但潛藏著積著的社會力量奔竄起來，衝擊着舊制度、舊規則的正當性。這些社會力量組合起來，形成了不同的社會運動，並嘗試透過各種建制以外的抗爭方式，團結社會中不同的集體與羣眾來爭取其本身應有的利益與權力。

究竟什麼是社會運動？這通常是被解釋為「一種有組織的集體性行為，透過各種手段和策略，企圖達成組織成員共同追求的目標」④。這樣的解釋自然難以了解社會運動的本質和價值意義。事實上社會運動是多面的、複雜的。表面看來，社會運動具有「反體制」的色彩，以一種「宰制／反宰制」的運動形式出現。「不論是資本主義體系中心的各種和平運動、生態運動、婦女運動和學生運動、或者是共產陣營中不斷湧現的不滿運動及自由化呼聲；甚或是第三世界國家淒厲的人民民主抗爭」⑤都是基於一種對人的自由與尊嚴的肯定。故社會運動可以說是現代社會一種人權伸張的表現。所挑戰的是現代社會制度的不合理、剝削與欺壓，亦可視為「新反抗運動」。但它不可以簡化為一種階級鬥爭來看待；而實際上，社會運動很多時表現為不同階級與羣體所連結的抗爭運動。別一方面它有很濃厚的

「自力救濟」色彩⑥，是一種民間力量的自動，自發的表現。

社會運動的出現，或多或少都牽涉到社會資源；利益分配的不公平問題上。所針對的不只是分配的不均等，而是整個社會資源分配原則背後的合理性與公平問題。社會運動是「民間社會中的成員重新建構他們集體社會認同的過程」。所針對的是「現存的國家控制體和被扭曲了的社會規範和秩序」，長遠目的必然是「重新建立新的規範，認同和價值」⑦。整體來說，社會運動必需有它本身對社會改革的方案和文化計劃（project）。在這裏問題的重心開始涉及到如何理解「國家」與「民間社會」的關係上。

國家觀念的構想

黑格爾與馬克思的國家觀是兩套截然不同的概念。黑格爾強調國家是普遍性的領域；普遍性利益與特殊性利益得到統一。它是一切階級調和的工具，故有所謂“universal class”⑧。但馬克思則認為國家只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階級壓迫的工具而已⑨。

而我們大概可以理解現代國家為一「由制度機器（institutional apparatuses）、官僚組織和構成、規範社會的規章所構成的「東西」。國家有它本身的自主性和獨立性，但是由於它的「工具性質」，卻使它與「統治階級」的直接利益關係掛鉤。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機器中的行政、司法和立法機關人員都是屬於擁有社會經濟和文化宰制優勢的階級⑩，加上大資本家、大企業，他們是社會上最強的壓力集團，能夠支配國家的注意力，使國家在調節和不同階級、集團的衝突利益時，難免有所偏差。有時候，國家亦會因為以發展經濟、累積資本為名而壓抑甚至犧牲社會大眾的利益，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台灣的經濟發展，背後所隱藏的社會問題便是一個好例子。

然而在國家執行政策的過程中，所要考慮的並不只是單單是資本利益的問題。而是要顧及如何處理「資本積累」與「民主正當性」這

兩個問題所產生出來的結構性衝突與矛盾^⑩。

這裏所指的結構性衝突與矛盾是指一方面，國家政制是透過民主原則或代議政制而決定的，其本身應該是擁有社會的「公信力」；但別一方面，國家權力的實質內容則被資本積累過程之持續要求所決定^⑪，即國家行使權力的同時，亦必需考慮到經濟發展與經濟部門內的利益關係。如何平衡協調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與其所帶來的社會成本（social cost），和保障社會之所有成員的集體利益則成爲國家基要任務。

「理性化」沒有解決這種矛盾和衝突，反使國家機器深深陷於這種結構性的矛盾的羅網中。原因是國家以這種「目的理性結構」（purpose-rational structure）爲基礎的技術官僚規劃（technobureaucratic planning）——以組織的、計劃的、法規的技術來解決矛盾，非但沒有解決問題，所產生的政策失敗，政策衝突和社會抗議比它所能解決的問題還要多。^⑫

相對於國家而言，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可以說是另一個重要的概念。民間社會與國家的關係並非甘陽先生所講的一個硬幣的正反面那麼簡單^⑬。民間社會有它本身的發展邏輯與發展過程；和國家關係亦非一種良性的互動關係。事實上，國家、法律與資本的連結，對民間社會的壓抑，使兩者關係常處於衝突與矛盾的狀態裏。

「民間社會」的觀念在西方有很多不同的意思。自由主義者認爲民間社會就是國家建立之後之有規則的社會。它的建立就是要針對國家的壟斷。而傳統馬克思主義者則指出民間社會其實是一個理想狀態下的資本主義社會。下層建築（infrastructure）的生產關係已經決定了民間社會的本質。所以民間社會亦不外是一個存在着階級對立、異化、剝削的階級社會。而另一個觀點，如韋伯（Weber）、涂爾幹（Durkheim）、托克維爾（Tocqueville）則認爲民間社會具有社會生活自主的面向和自主性，並不依賴國家的干預和保證，而民間社會中的自治與自由結社對民主政治是十分重要的^⑭。正如涂爾幹所說，由於市民社會的出現，使得國家與個人不再直接面對，而有了不同羣體爲中介，社會變得比較多元，有利政治民主^⑮。

傳統社會學理論對民間社會的不同觀點，均說明了民間社會的多面性和複雜性。事實上，對「民間社會理論」的重建。在今天學術

界，甚至社會中，亦有不少的討論。有人認爲民間社會是資本主義生產領域和國家機器運作影響下人民主體作出抗爭的「場所」^⑯。這種和社會運動相結合的民間社會理論，亦演生出別一套概念——即人民民主抗爭（popular-democratic struggle）。

同樣的理論均針對資本主義社會下，國家、法律與資本對社會的支配與抑壓。國家機構日益科層化（bureaucratization）、技術官僚（technocrat）對制度，對人的自主性的支配與規範、甚至社會生活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與及文化生活的大眾化（cultural massification）對人的創造力、思考力的影響，均使各社會範疇的主體（工人、居民、婦女、宗教人士等等），皆受支配^⑰。同時資本主義生產亦扭曲了自然與人的關係，形成生態污染問題。再加上公共領域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⑱，一般民眾對社會政策均表現冷感。正如葛蘭西（Gramsci）認爲資產階級在民間社會中擁有主導權（hegemony）^⑲，要爲民間社會發展抗爭空間、爲社會運動尋找方向，必需要重新建立一套新的社會意識與文化。

故社會運動可以說是民間社會「社會力」的表現。因爲社會的本質從來就不是靜態的（static）；它是矛盾衝突與規範價值建構交互作用的產物。社會中各種剝削、迫害怎樣倚仗社會運動來進行反抗，則成爲「無權者的權力」。這種理論既沒有傳統左派強調階級鬥爭，不斷革命那麼激烈，亦不流於將議會政治大化民主的癡結。台灣的「自力救濟」運動的出現，正是因爲某些社會成員因受到社會制度的不公平對待，利益長期被損害，而又投訴無路（公權力不彰之故），才選擇街頭抗議的鬥爭方式。



不少學者認爲社會運動之所以得以在八十年代的台灣社會勃興，主要是有它的歷史與結構性的根源。在這十年中，主導台灣社會的政治結構、經濟結構、規範系統和文化價值觀念都遭受來自內外環境的衝擊，而在快速的改變和轉化^⑳。其中最重要的是國民黨所建構的威權黨國體制的瓦解及邊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peripheral capitalist development）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的惡化。而事實上，台灣的政治與經濟的發展有着緊密的關係，使國民黨的威權黨國體制成爲政治與經濟權力的複合體。

危機理論與台灣社會

哈伯瑪斯（Habermas）認爲，現代資本主義的特徵是國家在經濟與其他社會領域佔有絕對優勢與支配性地位^㉑。哈伯瑪斯所講的現代先進資本主義（advanced capitalism）所出現的「危機」（crisis），亦可以用來解釋台灣發展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所出現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合法性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當然不都是完全適合）。

國民黨自遷台以後，爲求政治上的穩定，續在極度壓縮的情況下發展經濟。在強而有力的威權國家支持下，透過「目的——手段合理性」與效率的邏輯，進行高度資本積累^㉒。我嚴體制對台灣社會的壓抑，個人基本權利受到剝削。而快速經濟力量的累積，卻造成很多有形無形的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環境的破壞。

隨着內外環境的轉變，到七十年代，國民黨政府開始受到政治的「正當性」問題所困擾。

事實上，七十年代的國民黨政府所還遇到的統治危機，是基於當時的社會「指導機制」（steering mechanism）在威權統治底下無法進行適當的「危機反應」（crisis respond），結果在內外環境的衝擊下，國民黨政府只好進行「退縮正當化」（backward legitimation）^㉓，對國內的反對勢力進行壓制。自「美麗島事件」^㉔後，在八零到八四年間，台灣政治、社會運動亦曾經沉寂下來。

危機感與社運

然而客觀的外在條件已經不容國民黨再對政治與社會上反對運動進行壓制。而急劇的轉變，台灣的政治社會制度亦不能不作出相應的改變。

「危機」一詞，被用來指涉體系內的一種變遷，而在社會整合的層次上，是「個人作爲社會成員之身份威脅」。八十年代的台灣，公權力不彰、黨國官僚體制的癱瘓以及人民對政府的公信力失去支持，均足使社會「自力救濟」運動的興起。這種「危機感」，使社會不同的民眾開始自覺到有自我保護的必要。到一九八九年底爲止，台灣的新興社會運動已有十八種，而解嚴前（八零至八六）即有七種^㉕。例如消費者運動、反污染自力救濟運動、生態保育運動、原住民人權運動；以至解嚴前後所出現的勞工運動、農民運動、到近期的無住屋



者團結運動等等運動的興起，均說明民間社會的社會力正在茁長中，而很多運動的主體參與者都是來自草根階級的。

台灣的社會運動雖然正在發展的階段中，但其中所遇到的問題是不容易解決的。亦由於台灣民間社會的發展基礎的局限^②，未能完全凝聚足夠力量，發展具備自主性的西方式民間社會。社會運動是一種長遠而持續下去的社會事業，是在衝突矛盾中尋求一種新的、可以共享之社會文化與價值。^③



注釋：

①「自由化與民主化；前者指涉威權政治的瓦解和基本自由的獲取；後者指涉政治權力運作和平轉移的制度化」；參考：王振寰：〈社會運動的政治化及其問題〉，《中國論壇》，第十三期，三十二卷第二期；民國八零年十一月一日。頁四十一至四十四。

②徐正光：〈社會運動的理性運作〉，《社會重建》，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民國八零年，頁三十至三十七。

③杭之：〈在社會生活之核心中燃燒的火焰〉，《邁向後美麗島的民間社會》（下冊），唐山出版社；一九九零年，頁二二七至二三六。

④徐正光：〈社會運動的理性運作〉，頁三十。

⑤南方朔：〈「反」的政治社會學〉，久大文化；台北，一九九一年。

⑥徐正光：〈社會運動的理性運作〉，頁三十。

⑦蕭新煌：〈解嚴後社會與國家關係的重組〉，《中國論壇》，第三五四期，三十卷第六期；民國七九年六月廿五日，頁六十八至八十。

⑧袁華音：《西方社會思想史》，南開大學出版社；天津，八八年，頁三九一至三九二。

⑨李英明：《馬克社會衝突論》，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台北，民國七九年，頁一一二。

⑩同上。

⑪杭之：〈國家政策與批評的公共論述〉，《邁向後美麗島的民間社會》；頁二五九至二九七。

⑫同上。

⑬同上。

⑭甘陽：〈「民間社會」概念批判〉，《中國論壇》，第十三期，三十二卷第二期；民國八零年十一月一日，頁六十六至七十三。

⑮關於國家和民間社會的關係，請參 John Keane,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London: Verso, 1988。

⑯王振寰：〈詭譎的九十年代社會圖像〉，《中國論壇》，第三四三期，廿九卷第七期；民國七九年一月十日，頁十九至廿五。

⑰葉蔭聰：〈「民間社會理論」簡介〉，《天安門評論》，第一卷第二七三期，一九九一年五月，頁一零四至一一四。

⑱同上。

⑲杭之：〈邁向後美麗島的民間社會〉（上冊），頁

⑳李英明：《馬克社會衝突論》，頁一百三十。

㉑有關台灣在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所受到的內外環境的衝擊，請參：徐正光：〈社會運動的理性運作〉，《社會重建》，頁三十至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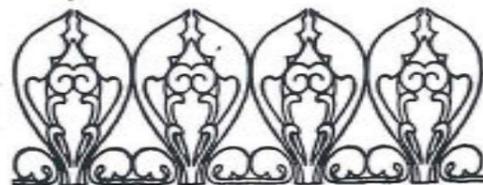
㉒克萊博著，廖立文譯：《當代社會理論》，桂冠圖書，台北，頁十七至三百二十。

㉓吳介民：〈反對運動與社會抗議的互動〉，《中國論壇》，第三三五期，二十八卷第十一期；民國七十八年九月十日，頁三十三。

㉔王振寰：《詭譎的九〇年代社會圖像》，頁廿一。

㉕有關「美麗島事件」及台灣民主發展，請參李筱峯：《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自立晚報，八二年。

㉖有關台灣民間社會的發展的限制，請參：王振寰：〈出現中的市民社會及其限制〉，《二十一世紀》，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第五期；九一年六月，頁五十七至六十七。



書介：《思考方法論集》

■ 林權（歷史二）

書名：思考方法論集
作者：李天命
出版社：香港青年書社
出版年份：一九八一年

在大約兩年的學習中，我發現自己與及一些同學，都未曾認真學習過思考的方法，常有以下的問題：

一、閱讀參考書籍或聽老師授課時，常不知不覺接受了一些語意不清或見解含糊的論點。

二、寫作學術文章或課堂討論時，思路糾結，未能深入準確把握所思考的問題，表達不清晰，見解空洞含混。

或許會有人說：「思考和說話是很自由的，根本不須什麼方法，也不須計較一字一句的意思，否則就是吹毛求疵，白費時間。」

我不同意這觀點。清楚表達自己的思想、見解，是學術研究、甚至和別人溝通的基本要求。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們思想時，必須掌握一套思考方法的「利器」，這樣，我們的思考才會清晰、精密、合理，我們才能疏通自己感亂偏執的思想，澄清學習時混淆的概念，破斥別人的文字把戲，清楚表達自己的論點，如李博士所言，語理分析可貴之處，是能使我們的立論沒有隱藏和虛飾，無論對的、錯的見解，也一目了然。

所以，他寫作此書，是要介紹這個思考方法學（methodology of thinking）的第一環節或基礎部門——「語理分析」（logico-linguistic analysis）。他解釋，這種思考方法，是要先「釐清主要用語的意思，辨明關鍵論點的義理，由此着手去分析問題」（頁九）

我們在寫作學術文章或在課堂討論時，經常沒有做好這思考的基本工作，即是沒有先釐清問題的意思，才進一步分析討論，結果，同學之間只是胡亂爭論，用此書內之比喻，就是「盲俠鬥盲俠」一互不碰頭。

作者列舉了四類常見的「文字把戲」，作為運用語理分析的例子，這些例子也許是我們平日的毛病。

例如有人說：「在某個意義下……」，「從？學的觀點來分析……」，如果這人沒有

具體指出某個「意義」或「從？學的觀點」究竟是什麼，那麼類言論就會含糊，這是其中一種文字把戲；又例如「中國政府的投資太多，因而引發通漲」。「太多」是幾多呢？這論點是空泛的。

作者指出，字眼籠統，內容空洞的言論，有很多事例可以說成是支持這類論點的証據，而且，別人亦難以提出批評、反証。但是，因為「這類言論不能提供任何確定的知識或具體的指引」（頁廿六）。所以可以說是沒有學術價值的。

本書第二篇中，作者分析了六種「語言陷阱」，這是某些語辭或使用語辭的方法，特別容易誤導、混淆、妨礙我們思考學術問題。

例如「關義」（meaning-incomplete），這是指句子的意義未完整。好像「民主制度是最妥善的政制」一句，是關義的，因為說話的人未解釋怎樣是最妥善，從誰的立場看是最妥善？從商人的立場？工人的立場？

書介

另一種陷阱是「歧義」(ambiguous)的語辭，這是指有兩個或以上不同意義的語辭。例如「中國工人是否自由？」一句中，自由一詞是指經濟自由、言論自由、還是轉業自由？

第三種是「含混」(vague)的語辭，含混指「一個語辭的應用範圍沒有截然明確的界線。」(頁四十六)好像「中國人的民族性妨礙現代化」一句，「民族性」是指什麼呢？風俗？習慣？……

第四種是「著色」(coloured)，我們常常會用著色(帶感情色彩)的言論，去誘使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這在學術研究是不應該的。如「共黨的獨裁暴政是中國落後的原因」，「暴政」一詞是過於感情化。

第五種是「實化」(reification)。意思是把「不是指具體實物」(如社會、國家)的名詞，當作指具體實物的名詞來使用。例如「中國文化已垂危」，「文化」不是人，不能說是「垂危」。

最後一種是「癖義」(idiosyncratic sense)。指我們隨意遠離慣常用法，而按照自己的特殊用法去用字，又不清楚說明的話，別人會難以了解我們的意思。

綜觀全書最重要的部份是第三篇(兩個基本的哲學區分)，篇中介紹了邏輯經驗論(logical empiricism)的兩個「方法學區

分」。即是(-)分析語句與綜合語句之分——「析合區分」。

(二)有認知意義與無認知意義之分——“意義區分”。

作者強調此兩種方法學區分是極重要、極有效的思想利器。我認為「意義區分」特別能夠幫助我們思考和學習，因為我們學習時，實在須要清楚那些學術觀點有「認知意義」，那些「無認知意義」。只有「有認知意義」的思想見解，才是有學術價值的。

「認知意義」有何意思？說一語句或見解有認知意義，就是指「我們知道這語句在什麼情況下為真，在什麼情況下為假」(頁九十一)，而「令得一個語句為真或為假的情況稱為那語句的『真假條件』(truth-conditions)」(頁九十一)任何語句必須有真假條件，才是「有認知意義」。例如「中國大陸有十一億居民」。一句話，是「有認知意義」的，因為我們起碼知道怎樣算是中國大陸居民，能夠分辨那些人是中國大陸居民；故此，我們能判斷這句話在什麼情況不是真，在什麼情況下是假，原則上我們便有可能進一步考察(如以人口統計方法)，證明這句話事實上是真還是假。

但，「沒有認知意義的語句是說不上『真』或『假』的，也就是無所謂『真』或『假』的，因此乃是『假都不知』的」(頁九十一)。例如「中國的傳統文化包袱是否太重？」一句是沒有認知意義的，因為「傳統文化」是指什麼呢？儒家思想、風俗習慣、中醫醫學、或是文學呢？「太重」？怎樣是才是「太重」呢？另外，中國是一個國家，又怎樣「背包袱」呢？我們根本不知道這句話的真假條件，更談不上嘗試印證這句話是真還是假，故此，這句話是「假都不知」、無認知意義的偽問題(pseudo-problem)。

以上只簡單介紹了本書部份內容，嘗試用一些語句例子，來幫助同學瞭解作者某些的觀點，文中錯誤之處，懇請同學(特別是修讀過有關哲學科目的同學)見諒。

最後，衷心希望各同學能認真研讀這本書或有關思考方法的書籍文章，深信我們如掌握「思考利器」之後，必可避免掉進文學圈套中，作繭自縛，學習亦能更加嚴謹。



創作版

憶仲夏北京之行

■ 陳永康

南雁北飛未知還，恍然心驚日向晚，
垂楊尚綠那堪折，靜待一年一代臨。



沉默

■ 張少強

微弱的餘暉，
無力地照着繁囂——

在海傍邊，

你

默默地，

垂下頭來望着地。

我

無奈地，

凝望着你輕輕的嗟嘆。

始終說不出一句話來——

沉默的僵局，

死寂的氣氛，

彷彿被飄來的細雨敲破。

你

無意地，

碰上了我的目光。

怎料？

四目交投的一刻，

欲語還休的一刻，

你卻故意地逃避。

我那張嘴吧，

只好再緊緊的合上。

隨着雨點的灑下，

你的呼吸，

漸漸深沉。

正當，

我要說話的時候，

你微微顫抖的身軀；

已緩緩地消失於長街的背影。

悠悠的蒼天

無端的添黑起來——

新詩

記着給我寫信

■ 陳紅

把心輕輕地塞進信封

再貼上深深的一切

就這樣寄出一封相思

每天最奇妙的時刻

是坐在床前的書桌

燃一盞昏黃的燈火

握一管醜滿柔情的鋼筆

寫下一行行在心中跳躍的聲音

窗外的夜色濃不過窗內的掛

潔白的信紙是你深沉的凝望

每一個夜晚

我的思念合起你晶瑩的雙眼

與你走進相同的夢

夢裏

依稀有個熟悉的声音

「記着，給我寫信，記着……」

九一年七月一日夜



懷人

■ 芷曰

夜夜望澄天 明月幾時圓

澄天無烏雲 繁星天上閃

心願明月圓 夕夕可相見

月月有圓時 懷人倍思念

天上月有圓 地上無缺損

月缺月再圓 人缺難再團

不願見月圓 離人暗自憐

遲

■ 芷曰

痴等痴望相見時

似愛似避無了時

聚了又分散又分

難捨難離難分離

相對相望相距離

相分相念相聚期

痴笑痴兒多嗔痴

空等空望空恨遲

憑着愛

■ 班代表

一個寂靜的晚上，我獨自一人在家裏休息。不着意地聽到收音機傳來的一首歌——憑着愛，優美的旋律和動人的歌詞，勾起我絲絲的記憶……

「曾踏遍，刺骨的彎路，疲倦了，誰來傾訴，遇過幾多痴情，怎會不知道，但我深知總有一日，定會找得到更好。憑着愛，我信有出路，憑着愛，情懷不老；在這一剎跟你，終於可擁抱，就算始終失意倒運，人生已再沒苦惱。曾在這高高低低彎彎曲曲中跌倒，才驟覺開開心心簡簡單單已極好，最美麗仍然是愛，帶淚嚙仍然是好，未懼怕一生的波折磨練到老。」

一個學生難忘的經歷，藉着這首歌，又在我腦海中浮現出來。中七那年，是中學時期最辛苦的一年，每天過着沉悶而單調的生活，不是讀書上課便是吃飯睡覺，沒有一絲時間可以放鬆。再加上大部份同學都考進中文大學，更覺得自己在孤軍作戰。可惜不幸的事終於來臨，考出來的成績差得連我自己也不能接受，花了兩年多的努力竟然白費了，我入大學讀書的理想終成泡影。這一刻，彷彿跌進不見天日的深淵，一切希望也沒有了，只有滿眶淚滴的離開學校。

在那低沉的日子裏，沒有人來傾訴，得不到同學的慰問、關心或支持。我看不清前面的路是怎樣，只好無目的地繼續向前行，我只知道這時沒有光，只有漆黑一片的黑夜。

在黑夜裏我碰見一個我已認識了很久的朋友，「他」的出現使我的人生重新得着新希望。當我的朋友完全離開我的時候，「他」安慰我，鼓勵我，支持我，教導我，使我重新得着力量，充滿信心和盼望的向前奔跑。「他」說：「你只要朝着那顆閃着亮光的星星奔走，他便會引導你向光明的道路，黑夜會離去，接着而來的便是美麗的破曉。」我相信「他」的說話，總會讓我找得到更好，「他」的擁抱，使我覺得就算失意倒運，人生已再沒苦惱。

經過「他」的鼓勵後，我再接再勵的作第二次嘗試。因為心中有了「他」，所以我更覺有力量、信心。「他」還安排一些課程給我，幫助我改善弱點，我真的大有進步！「他」又常常找我傾訴，使我的生活沒有那麼枯燥，有了寄託，就有了力量。

憑着星光的帶領，終於步進光明。一個橙黃色的太陽慢慢地從水平線升上來，標誌着新的一

天，新的希望。第二次的嘗試雖然不能使我進入大學，但也能成為浸會學生。這結果不但沒有使我失望，反而覺得很高興，因為我終於戰勝自己，我沒有被考試結果所纏鎖，更沒有屈服於壓力之下。波折難阻，反成為磨練意志、毅力、信心和忍耐的好機會。「未懼怕一生的波折磨練到老」一句令我有很大的感觸。

這位朋友還教了我一個字——愛。他這樣說：「愛是恒久忍耐，又是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憑着愛，我們可以使生活更美好，更安全；憑着愛，世界便會更快樂，更和平。「他」的話，深深的刻在我心裏，使我的人生充滿亮光和溫暖。這份愛成為我人生所追求的目標。我深信，只要我們相愛，我們便不虛度此生。

讓這份愛遠飄到白雲外，
為你們把心中的枷鎖放開，
在那青天寫上我心底話，
願你們一心一意去裝載，
在你們心中寫上新希望，
讓你你今天找到了方向。◎

歲暮

■ 謝慧芬

「對……，對不起，我不是有意把碗打破的！」一家人都緊張地圍了過來，目瞪口呆地望着我，空氣頓時凝結了半分鐘，當時幸有慈愛的公公為我解圍，要不屁股準會個大開花！其實我只不過是在過年前打破了隻飯碗而已，但對迷信的父母來說，可真是件不得了的大事，而此次事件，可以說是那年歲暮的一段小插曲！

幼時的我，最不明白什麼叫「過年」，然而心中卻老是盼望它的到臨。每到歲暮，在父母的一聲令下，大家便七手八腳地幹起活來：你拿掃把，我會濕布，將家裏由內到外仔細地刷洗一番，雖然幹得滿頭大汗，但其中的樂趣卻非筆墨所能形容！

新年將至，兄弟姐妹間為爭奪新衣，搶新鞋的吵鬧聲更是習以為常，父母親的責罵早被我們這一羣孩子的歡樂聲趕得遠遠的，家裡充滿着歡笑聲！

童年時過年是最快樂、最幸福的。記得某一年的歲暮，三哥把一把一把的糖果滿滿地塞在我手中：「三妹，快吃，要不然給二姐發現了，那就★口甚麼都沒得吃了！」當時的我實在太感動了，險些兒連眼淚都淌下來哩！還有一次，在一年一度的村中歲晚大宴會中，我們幾個年齡相若的小孩子偷偷地把米酒喝光了，昏醉在草叢邊，父母不見了我們，被嚇得大跳，連村中的壯丁

都給出動了，結果……我們當然挨了一頓打！每當想起這些快樂的片段，就打從心底裡笑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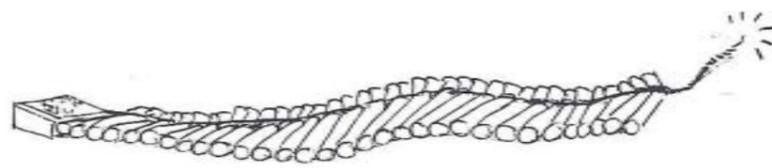
如今的我，同樣地要迎接新年的來臨，然而孩提時的那番樂趣再也找不回來了：哥哥不再是一把把的糖果塞給我，而是把一盒盒被包裝得精美的禮盒送過來；現在也沒有人再去爭新衣，搶新鞋了，因為即使不是在過年這過大日子我們都常買；喝酒？請自便，只要你願意，雪櫃有的是；公公再也不袒護我了，他老人家早已在天堂安息；家中依舊清洗、打掃，但已不是我們孩子們的工作了一留給家裏的鐘點工人幹吧！美味的糕點也不再是媽媽精心泡製，而是餅店機器的產品！一切一切都過去了，一切一切都遠了！

回想去年，過得實在並不如意，唯有把祖先們留下的箴言反覆思索：「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是呀！舊的不去，新的又怎能來呢？逆境不過，順境又怎能來呢？年末是反省檢討的最佳時刻。對，過去的就讓它過去，不必追悔，不必緬懷，正所謂：「一年之計在於春」，新的一年帶來新的希望和新的開始，我們應該把握今天、掌握未來！

路是崎嶇的，不論是過去還是未來，無數的困難、不盡的挑戰都在等待着我們，因此個人的毅力和勇氣是很重要的，它們既

是我們戰勝困難的武器，又是我們精神的良伴。過去的一年，我在絕望中渡過，在黑暗中摸索，歲暮了，我該完完全全地清醒了，雖然陽光還離着我很遠，但我不懈地向前邁進，向前邁進！

噢！門外那一張張孩子的笑臉，一串串歡樂的笑聲，像在告訴我們：新的一年又來到了，快把緊閉的心扉打開吧！世界是那樣的香，花兒是那樣的香，新的一年是充滿希望的，別再站在門沿了，快踏出來吧，美好的世界在等着你呢！◎



永恒的周恩來

■ 璇璣

最近，城裏城外突然掀起了好一陣子研究周恩來總理的風潮。

顯然，大家並未忘懷他。一齣戲，幾部書，若干散論，頓使他成為每一個人談論的焦點。熱功熱過？是褒或貶？他是鞠躬盡瘁的偉人，還是心狠手辣的特務頭子？

但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當曾經灑射天下的紅太陽冉冉退下，再沒有熱力去燒融千萬人的心靈的時候，我們赫然發覺，最使我們念念不忘的，竟然是他——周恩來。

曾有論謂，周恩來雖有功德，且於文革時期保護大量知識分子，對當時國家的穩定有重大貢獻，但是他從來沒有反抗毛澤東在文革時期的種種錯誤決策，對於一場又一場的文化浩劫，他沒有主動去制止，只進行了一些緩和及調停的工作，間接地助長了文革的氣焰云云。此論似未符公允。就當時混亂不堪的情況而言，即使策動文革的毛澤東本人，亦未必有控制全局之能，又何況其他威信不足以與毛澤東相比的老臣子？眼見一個又一個的伙伴被打倒，國務院不斷的被架空，如果周恩來當時不採讓步政策而進行反擊的話，這個世界充其量只會多了一個劉少奇或是賀龍罷了。是時，誰去進行調停和救援的工作？誰能在動盪的時刻去稍稍維持國家的生產秩序？誰能使中國在險峻的國際形勢下踏出開放的第一步？又有誰能在反黨反革命罪名的籠罩下保住了以鄧小平為首的一班倡導改革開放的幹部呢？

依此推論，周恩來在當時的做法，不是退縮，是忍辱負重；不是盲從，而是顧慮周詳。這種情形，正合乎了蘇軾在留侯論中對於「能忍人所不能忍」的勇者的論點。周是一個無論在甚麼時候都能夠保持其清醒頭腦的人。正因如此，他清楚地了解到「拔劍而起，挺身而鬥」的匹夫之勇並不能對抗當時那股無堅不摧的洪流。

另外，亦嘗有論謂周為特務組織之首而非難之，然此亦非常中肯之論。試問當時世界那一大國沒有特務組織的存在，又有那一位政要元首與特務組織扯不上絲毫關係？況且自中共成立以來，即面對國民黨全面的清黨行動及不斷圍剿，接踵而來的是中日八年抗戰及國共歷時三年多的內戰，為求在嚴峻的局面中掌握先機，作出適當的部署，特務組織的成立，在當時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美、蘇等國固不待言，即使與毛、周等對立的蔣介石、又何嘗不是極盡此道之能事？論者又何以厚此薄彼？就只因為周是共產黨人而如此嚴苛相待嗎？

無可否認，周恩來總理一生的行事為人不可能毫無瑕疵。由他一手提拔的鄧小平便曾承認周在文革中處境困難，也說過「違

心的話」，做過「違心的事」，但亦正如鄧所言：「……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的作用……」身兼總理及外長之職的他，以其超人的精力、高雅之氣度、堅定的信心及圓通的外交手腕、奠定了國家的根基、緩和了尖銳的矛盾、也為國際秩序的平衡和穩定寫下關鍵的一章。無論對他有如何尖刻批評的人，對於他的成就及貢獻卻也無法否定。

周恩來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有其獨特的影響力及魅力。前美國總統尼克遜對他有以下的一段追述：

「在中國，周將作為維護黨和國家統一的傑出領袖而活在人們心裏；在世界上，他將作為中國首屈一指的交外家而留在人們的記憶中。他是中國的特涅克、莫洛托夫和杜勒斯。談判中天生敏捷的才思，對國際各種因素洞若觀火的了解，來自思想信仰胸有成竹的氣度，對外國國情的瞭如指掌，以及對歷史的高瞻遠矚和深厚的個人閱歷，凡此種種溶於一爐，造就了周恩來其人——當代獨步一時的外交家之一。」

是他，將長久地活在人們的心中——永恒的周恩來。



雜話一則

■ 黃子華

在創造與毀滅中的一小片空間，曾有一片樂土，在它之上，泛着一種叫仁的美德。但是，這樂土卻終淪為一塊凶地。有人說：是因為上帝死了。也有人說：是因為上帝不是死了。

神造天地。為了使星光能夠吸引人的注目，祂使深夜的靈魂看不見晴空。為了義人能受世人的歌頌，祂容許罪惡在大地上散播悲哀的種子。

義人的作為令人欣喜，當仁的花朵開遍地上的時候，大地是一樂土，不需要政府，不需要法律，不需要聖經，也不需要神。純真的靈魂在大地上起舞，愛自己，愛別人，愛世上的一切，愛不在世上的一切。

光明與黑暗的邂逅注定了地上第一次的痛哭。當人的智慧還未形成，聖經還只是人們夢中一些奇怪的字句的時候，惡魔所造的生命被神趕到大地，神並使牠因寂寞而冰冷。一天，樂土中最美麗的長髮姑娘和她的快樂一起散步，憐憫的心並叫她把蛇抱入千萬男子渴望闖入的懷中，好使牠溫暖。令人厭惡的生物不但不因使人羨慕而高興，還以毒液吻向那徘徊在多少男子甜夢裏的粉頸中。未來得及慘叫，姑娘的生命已離開人間！走時還挽着她的愛心，她的快樂和她的溫暖。



姑娘灰黑色的面孔令到大地上一半的人傷心和憤怒，他們誓要為蛇的歷史加上終止符。有人拿出了刀，有人燃起了火。

但是，大地上唯一沒有傷心和憤怒的男子，一個義人，他打動人的聲音勸說眾人收斂殺氣，並教眾人以德報怨，每天原諒別人七十個七次……義人的講話並不足以平息眾人的憤怒，猶如杯水不足蓋掩燎天之火。但是在他收口前，那狡詐的生物已溜得不知所踪了。當夜，義人被殺害，奪去他生命的刀子，多得可堆成一個小山；擲走他屋子的火把，使天上的日月以為又多了一個兄弟。

因為以德報怨，每天原諒別人七十個七次的教訓已流傳了，所以沒有人追究義人的死。在此之後，仍有不少婦女在蛇冷時抱牠入懷，在蛇飢時給牠食物，在蛇渴時給牠水……而終於全身變成灰黑。

人類被逐離伊甸園是因為擁有智慧。智慧的痛苦使他們哀號：為何要以德報怨？為何每天姑息罪惡七十個七次？為何人一犯錯就遭神趕到大地？他們對義人教訓提出了沒有答案的質問：道德的創造者是神還是人？

當智慧突破了教條的時候，大地上的人決定仍堅守仁的美德——除了對蛇之外。他們要潔淨大地！樹木生長的森林不可有火，小孩玩耍的山坡不可有狼。有人拿刀，有人用火，把毒蛇一一殺掉。

自有永有的存在也許是無聊頂透，永難超越自己的處境何來樂趣？人類都應當被超越，完美者卻在祂自己創造的命還裏無所事事。可能太弱的對手只會使遊

戲變得乏味，神使魔鬼有能力造出永恒的東西。蛇的靈魂離開已死的軀體，有些又回到軀體中，有些更走進各樣蟲鳥獸中，但最大的部份，竟然霸佔了形像如同上帝的軀體！

自那天起，人恐慌了，人迷失了。

有人對別人救急扶危，結果反遭其害。有人捉到殺人犯，但因對方聲淚俱下而把他放走，終於成為對方的晚餐。有人每天只原諒別人七次，所以他對同一個劫匪手下留情六次後，氣力不繼而終於贏得被劫殺的經驗。

自那天起，人被迫恐慌了，人被迫迷失了，人被迫墮落了！唯一仍把光榮握在手的，是那個炫耀光榮的說教者。但祂卻有一個令人不解的習慣：一方面嚷着要最美麗的花朵，一方面卻把山羊、害蟲等關進花園，然後責怪着花朵不能好好生長。



祖佑，二十三歲，剛在一間大專院校設計系畢業，現正在一間室內設計公司工作。祖佑從出生至今，平平淡淡，並沒遇過什麼「風浪」，由呱呱墮地到求學，每一個階段，他的爸爸都為他安排得十分妥當，祖佑就在父親的呵護備至下成長。但祖佑並不覺得特別開心，他畢竟是一個充滿理想、幹勁十足的青年，他不甘心於受人束縛，受人「支配」，他不喜歡別人替他選擇，為他「鋪路」，反而極欲憑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才幹去將理想實現，去創一番的事業；因此他特別選擇「設計」作為職業，這除了是他的興趣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認為一個設計師可以完全自由地將自己的意念，構思和創意表現在自己的作品之中。

在事業上，祖佑的表現不俗，深受上司和客戶的嘉許，他的才華得到別人的賞識、得到別人的肯定，照理他應該感到高興才對，可是他仍若有所失，在他心中仍存在着一個「結」，一個令他耿耿於懷，難以打開的「結」，令他心中存着一份難以言喻的失落……

祖佑一家原住在舊式的公共屋邨，地方狹窄，早以不敷應用。早陣子，他們的居屋申請中簽，可以搬到較大的單位，全家人都非常雀躍，特別是祖佑，他是全家最開心的一個，不單是因為可以搬到較大的居住單位，較佳的居住環境，最令他興奮的是他相信這是一個好機會，可以讓他在父親面前一顯身手，因為他以為父親必定會把新屋的裝修設計交到他的手中，由他全權負責。

祖佑的父親雖然讀書不多，只曾在鄉下讀過幾年「卜卜齋」（舊式的學堂），但卻不是一個老粗；他很留意周圍的事情，每天報紙的港聞版、國際版和中國版定必是他的「例牌菜」，兩間電視台的新聞報導節目，更是他每晚吃飯時的「頭盤」，他並不時發表個人的「獨特見解」，所以，每到吃晚飯的時間，祖佑必可上一課很有「建設性」的政治課。

在別人眼中，祖佑的父親是一個開通，新潮的人，他年紀雖然已不小，但仍可以與一班年青人打成一片，絕不擺起長輩的架子，更不會板起嚴肅的面孔，恃老賣老，教訓別人；即使年青人和他開玩笑，他亦只會一笑置之，絕不發怒。每當別人問起他對自己兒子有什麼期望，他總愛說：「我最愛民主，最推崇自由，我很尊重他的意見，將來做什麼也好，由他自己決定好了。」每次祖佑聽到這句說話，心裏不其然會想問一句（但總不會說出來）：「是嗎？」

記得在小學畢業那年，祖佑已覺得自己對繪圖很感興趣，故考慮報讀工業中學，但遭到父親極力反對，堅持要祖佑入讀文法中學。當時年紀尚少的祖佑只好聽從父親的「安排」，唯父親之命是聽。中學會考放榜，祖佑成績不俗，可以順利升讀中六，可是他對設計的興趣更濃，毅然決定報讀理工和工業學院的設計課程，並獲取錄，可惜當父親知悉後，大發雷霆，他一心希望祖佑能夠考上大學，為家族爭光，為自己面上貼金。於是，父子各持己見，互不相讓。起初祖佑覺得

自己已長大，有自己的選擇權利，父親應該認同的，但面對父親強硬的態度，祖佑終於軟化，繼續升讀預科，以達成父親的願望。

結果，祖佑「幸運地」考不上大學，反考上理工的設計系；父親眼見祖佑既未能考入大學，也只好讓他入讀理工。祖佑就在這樣的情況下終能修讀自己喜歡的學科。因此，在父親面前顯示實力，爭取表現，以求能夠獲得父親的認同，得到父親予自己最大的自由，這是祖佑多年的心願，他一直希望可以完全依照自己的想法、意願去做事而父親全不左右自己，更重要的是父親能夠真正尊重自己的意見，故他希望借設計新屋這個機會去達到目的。

當他向父親提出由自己設計新屋時，父親並沒有反對，只是望了他一望，笑了一笑，輕拍他的肩膀，淡淡的說了一聲：「也好，就讓你試試吧！」那時，祖佑雖不在父親面前表現得太興奮，但他的靈魂兒卻早飄到九霄之外。因為這是父親多年來第一次讚同自己，而他亦是第一次在父親的允許下依自己所想去做。



祖佑滿心興奮，親自走到新屋量度尺寸，計算面積以作設計時之用。他好不忙碌，走來走去，新屋每一個角落也差不多被他踏過；與此同時，他滿腦子都充滿着構想，時刻都想着設計的意念，牆壁應髹上什麼顏色好呢？淺藍色、米色或是白色？地板用瓷磚還是柚木好呢？哪套傢俬適合呢？每天乘車，吃飯，甚至工作時也偷偷把那新屋的設計圖拿出來修改；每晚再弄到深夜才肯入睡，他的投入感較他對首份設計時更大。

更令他高興的是父親對自己整個設計過程，出奇的沒有加半點意見，從不過問祖佑的工作，和以前處處干涉、過問絕不一樣，他這時只相信父親終於肯讓自己自由發揮而絕不左右，干擾自己的決定。

經過個多星期的努力，設計圖終於完成，祖佑很滿意自己的作品，在完成的一刹那，他就像小孩子般興奮得叫了起來，並立刻將設計圖交到父親手上，且喜孜孜的不斷向父親講述這個設計的特點，亦將每一件擺設，每一件傢俬的位置詳細告訴父親，父親看了看設計圖，並留心着祖佑



的說話，然後小心翼翼地把它摺起來，放入抽屜內，最後還讚他做得很好。祖佑眼見父親如此重視自己，頓時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

由於工作關係，當將設計圖樣交給父親後，祖佑並沒有再到新屋，他以為父親一定會照自己的設計去裝修。如是者，過了數星期，祖佑從父親口中得悉新屋的裝修已接近完成，有些傢俬亦已經擺放好。為了早點一睹自己的心血，祖佑趁着午飯的時間，趕到新屋。但當他步進新屋時，發覺屋內的裝修竟和自己設計的全不一樣，牆上所髹的顏色和舊屋並無兩樣，客廳的枱椅並不是原先所設計的真皮沙發和玻璃茶几，而是傳統的紅木仿古傢俬，卻配以一個新款的組合櫃放在其中，設計不中不西，和祖佑原先的構想簡直有雲泥之別。

祖佑的腦，登時一面空白，他的心像被重錘痛擊一樣，擊得粉碎，他就像被好朋友出賣一樣悲痛；不，不是朋友，而是自己至親的人，祖佑只有呆呆的站在新屋的客廳中，良久不發出半點聲。對別人來說可能這只是一件小事，但父親的尊重、認同、讚賞、是夢寐以求的東西，可惜這一切已被摧毀，被一個他至親、絕對信任的人摧毀了；至此，祖佑猛然想到自己實在太天真，父親所說的一切都只是敷衍自己而已，父親其實對新屋早已有他自己的那一套，任何人也不可以改動的，祖佑的夢想一直都只是「妄想」，自己的「心血」早已被父親「埋」在抽屜之內，可憐的他還一直相信父親真的會接納、採用自己的設計，這一切都

只是假象；他開始明白到父親就是家中的主宰，家中的一切皆只可由他一個去決定，自己所有的意見在父親眼中皆只是無用之物，就算自己如何努力去爭取，都只是徒勞。

雖然祖佑的內心十分激動，他始終沒有在家人，特別是父親面前表露半分，他不想因此事與父親發生爭執（而且這已是不能改變的事實），以免執拗起來，影響父子間的感情；況且「大逆不道」之名實非每個人所想負上的，他只好無奈地接受這個事實。

新屋入伙，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飯，望着新屋，祖佑沒有絲絲的感覺；在他心目中，這好像不是自己的。無奈是他的感受，而沉默就是他的表情，祖佑覺得在父親面前，沉默永遠是最佳的表現。整頓飯，祖佑始終不發一言，只默默把飯菜送到自己的口中，儘管父親一直滔滔不絕地談着新屋的各種優點，但祖佑壓根兒沒有一點感受。

忽然，電視新聞報告播出了某個國家的領導人開會的情況，一個個年紀老邁，就連走路也要人摻扶的老人家在螢光幕出現，別小觀他們，他們就是主宰着全世界十多億人口的命運的「當家」。這時，祖佑的父親又發表他的見解，說了一句：「年紀這麼大，還霸着高位來幹什麼？應該將權力交給年青人；他們有新思想，有幹勁和魄力，由他們管理國家才對！」祖佑聽到父親這句話，頓時將目光投向電視螢光幕，再望一望父親，跟着又再垂下頭，心裏想：「真的可以嗎？」◎

成長

浪子

跋

—編者話

小時候，我天天盼望着能快點長大起來，成為「大人」，以便不用再上學和做家課，可以喜歡做甚麼便做甚麼，不用老是聽長輩們的訓導。現在我正式上課的時間已剩下不到三個月，而長輩們也早已不太理會我的事情了，照理我應為多年來的願望的達成而感到開心，但是，我發覺我現在已不那麼想成長了，因為我不知如何面對它。

小學的時候，只要媽媽給我五毛錢上學我便會開心不已，因為小息時我可用兩毛錢買一件蛋糕慢慢咀嚼，然後再用兩毛錢買一條「孖條」冰棍緩緩吮吸，剩下的一毛錢我會儲蓄起來，留待日後儲夠五毛錢用來買冰凍汽水喝。現在我當然有更多的錢作零用，於是在「聚龍閣」午餐一餐動輒便要四、五十元，身上所穿的衫褲鞋襪往往共值千元以上，平日行街吃飯也會用上好幾佰塊錢。物質條件的提升，無疑令我生活得更加舒適和方便，但是，漸漸地我發覺我的慾念越來越大，想要的東西越來越多，以往五毛錢的心靈滿足，現在再也找不到了。

小時候看電影，我會為生離死別的場面痛哭流涕，好像大猩猩「金剛」死時，我也流過滴滴眼淚。爸爸見我堂堂一個男孩子，居然會為不相關的人和事流淚，便教了我七個字：「男兒流血不流淚」。自此，我真的極少再輕彈熱淚，成為「真正」的男兒漢。記得不久以前看電視劇「灰網」的時候，妹妹仍為死於營救朋友的吳鎮宇低頭哭泣，而我卻已經可以無動於中了。多年來的教化，不但使我變成一個不

再流淚的人，而且也使我變成一個木頭人，我不再為他人的事而感到開心或哀痛，別人的事已全然打動不到我的情感。只有在看見別人比我優越時，內心才會不其然地充滿着嫉忌。我不知道這是否成長的必經階段，我只知道我生活在一個情感單一的國度裏。

孩童的時候，分辨是非對錯是很容易的。爸媽、老師和長輩的言行必定是正確的，他們所訓導的每一句話，只要遵從我便不用捱罵或捱打；至於壞人則必定是那些面目可憎的「大舊衰」，同學裏只要有一個又高又肥、類似「技安」的東西，他就必然是當「蝦蝦霸霸」的壞份子。因此，好人與壞人對我來說只是一件絕對和易辨的東西。但隨着歲月的增長，我發覺是非黑白原來不是那麼容易分辨的，長輩們所說所做的事情已不一定是對的了，而「技安」則可能是最純品的好人。一切以往是絕對的人和事現已變成相對的東西，好與壞已不再有共同一致的定義，而是因個人的看法而有着不同。最可信的朋友，會因意見或利益關係而出賣我，以為不可相信的人，則可能會在我最困難的時候雪中送炭。一切的事開始變得複雜和迷惘起來，於是我最相信的人現在只剩下自己，我的世界變得越來越狹小，年月的增長，不是令我更加明白是非，而是令我更加糊裏糊塗。

或許我對成長看得比較灰暗，忽略了其他美好的人和事，但我相信接受成長是一定要付出代價的，孩童時無憂無慮的赤子心，無可否認地，現已被成長慢慢洗褪了。◎



在暨南大學轉了兩個圈才找到七十幢樓，卻剛好是午飯時分。四層高的舊樓重門深鎖，從窗外看進去黑漆漆的怪冷清，外牆和窗戶的玻璃殘破得可怕。正想退後看深一點，地上的泥濘早已把鞋子弄得黏抓抓的，感覺更是怔忡不安。還是用神再打量一下，三樓某房間的牆角掛了把半新舊的電風扇，左邊窗架上掠了件還在滴水的襯衣，這才透露了多少人氣。兀自倚坐在插有槍杆的石壘上喘氣，對着面前的傘形老松想得神，忽地頭頂轟隆的傳來吭亮的甚麼昭告，原來懸在槍杆端的揚聲器在廣播電台新聞，說黨政最高層領導重申必須搞好計劃生育……

坐車離開石碑返市中心時讀着蕭乾的《郵票》——又一個「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的動人故事。反覆讀着最後一段。沉迷集郵的主角發現返老家為滿州國跟東洋鬼子復仇的同學的臨別遺書：

「我走了，羨慕你睡得那麼舒坦，不忍叫醒你。昨夜話，莫忘。郵票你撕了吧。那住址只告訴你：那就是我去拚命的地方。無從通訊。——知名不具。」唉，唉，不中用的我。」

無意識地望出車窗外發愣不知多久，回復知覺時車子剛駛過烈士陵園，又或者是烈士陵園的影像叫我回復知覺。鄰座那面貌清癯，幹粗活打扮的同志說甚麼「現在就只望老鄧的話說了算，還求啥?!」我半醒不惑的瞪着他，也許把他嚇怕了，以後就只跟同伴咕嚕着魚塘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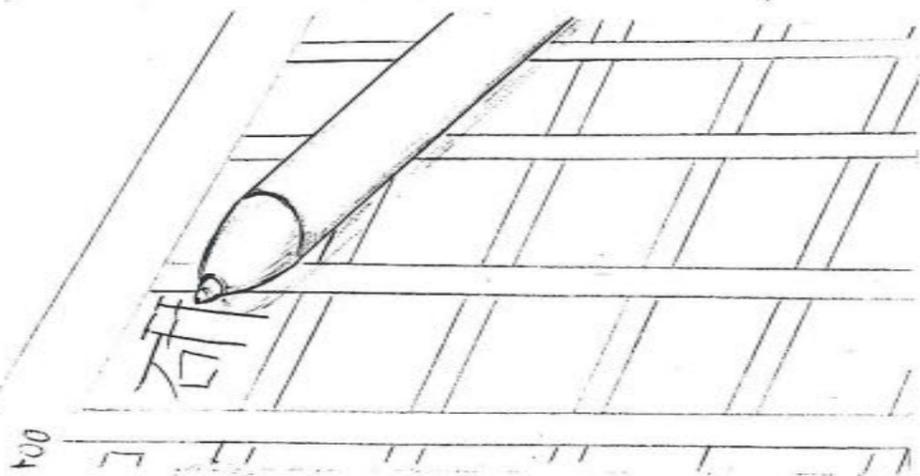
返港後一邊翻着舊報紙一邊胡思亂想：「六四」時香港有多少人口誅筆伐鄧小平，翻他這十年來的賬。他春節訪粵之後，又有多少人在暗暗為他打氣。我們在大學裏讀「中國研究」，投注了多了冷靜與學術符號去做研究做學問，到頭來大至一場運動小至一次南巡，與在魚塘幹粗活的老同志還不是彼此彼此？想到暨大殘破卻尚存的樓台，樓前的老松，蕭乾的《郵票》……我們能把此刻的赤子之心保住多久且仍歷久常青？抑或象牙塔令我們滋生多少倨傲與茅塞，以致無視學術的限制？更莫說反璞歸真，重新尋求「學術報國」的意義與歷史位置？「願乘風破萬里浪，甘面壁讀十年書」，盼與師友共勉。

繼去年的創刊號，中國研究學會年刊（九一至九二）終於面世了。其實，我們繼續編輯年刊，目的是透過把老師、同學的研習心得，乃至校園心聲匯聚成編，與同學交流。藉以激發同學們研習的興趣，並鼓勵同學對家國天下事的關心。

今年年刊共分為專題版、校園版、學術版和創作版。我們選了「中國人口與發展」作為專題版的主題，嘗試從經濟、地理、歷史和社會學四個角度，去探討這十多億人所引起的問題。謹此感謝郭益權教授、趙曉斌先生和李金強先生接受我們的訪問，以及邵一鳴博士為年刊撰稿。校園版為同學撰寫有關浸會中研生活的文章。而各級同學的投稿則依題材分別編於學術版和創作版。

籌辦年刊其實已有兩個多月，說長不長，說短不短，雖然仍有不少未臻完善之處，但畢竟我們幾個編委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希望高明之士不吝賜教。

最後，希望各同學能夠細心閱讀本年刊裏的每一篇文章，體味一下各篇文章中作者的見解和情懷。◎



鳴謝

李思名博士
郭益耀教授
趙曉斌先生
李金強先生
邵一鳴博士



中國研究學會年刊91-92 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執行編輯

封面設計
工作人員

羅麗明
陳少蘭
陸錦添
謝淑玲
謝鳳燕
謝志深
梁子華
黃柏林
陳周昭瓊
周蔡曉桃
袁麗芬
袁妙玲
袁建威
余佩珊

(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浸會學院中國研究學會